

陆安史志

2021年 第4期
总第38期

临安史志

LinAn Historical Records

目录

· 卷首 ·

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

· 史海钩沉 ·

“当代梁山的阮氏兄弟”——阮迪民革命生涯纪实(四)卞初阳4

听我的团长周文江讲那过去的故事王公民9

杭氧的前世今生李东升13

“七·五”洪水三烈士郑明曙18

古建筑里的忠孝传奇潘根春20

实践出真知——记青山民间艺术团出国访问演出时的翻译冯益民23

深山英冢汤向龙27

· 史志理论 ·

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的文化自信探析苏秋爽 雷家军30

口述史是编修高质量地方志书的需要金雄波38

吴越国首开北方茶叶之路顾彭荣 袁少华46

· 天目骄子 ·

普通一兵范常文53

主 办:中共杭州市临安区委党史研究室
杭州市临安区地方志研究室

主 编:方英儿

副 主 编:王飞熊 许月琴 刘金炎

责任编辑:庄雪君

编 辑:彭 铖 许锦光 李 湘

我的点滴经历杨国坎 57

· 吴越走笔 ·

求学路上三条岭杨菊三 64

忆岛石,最忆山核桃蒋瑞斌口述 帅军武记录 68

· 工作动态 ·

省老促会来临调研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工作70

9月主题党日活动:体验天目红盟“初心之旅”71

“清廉养心 健步养身”——区委党史研究室开展绿道毅行活动71

临安百年党史专题纪录片即将出炉72

区委党史研究室召开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学习会73

封一:周恩来演讲纪念亭

封二:市委党史研究室来临调研指导党史三卷编纂工作

封三:杭州市党史教育基地巡展走进临安

封四:青山水库

刊名题字:俞灵君

地 址:临安区锦城街道钱王街28号职工之家1号楼1808室

邮 编:311300

电 话:0571-63721571

邮 箱:65470965@qq.com

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党的伟大精神和光荣传统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强调“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回望近代中国历史，自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正在苦苦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指明了

方向，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中国共产党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所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引领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的精神支柱和强大动力。历史深刻证明，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华民族开始艰难地但不可逆转地走向伟大复兴。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

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饱经磨难而风华正茂,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到今天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在100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兵团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女排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科学家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伟大精神,形成了彰显党的性质宗旨和政治品格的精神谱系。这一系列伟大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

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这一系列伟大精神,蕴含着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精神密码,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全党同志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汲取信仰力量、查找党性差距、校准前进方向的丰富源泉,是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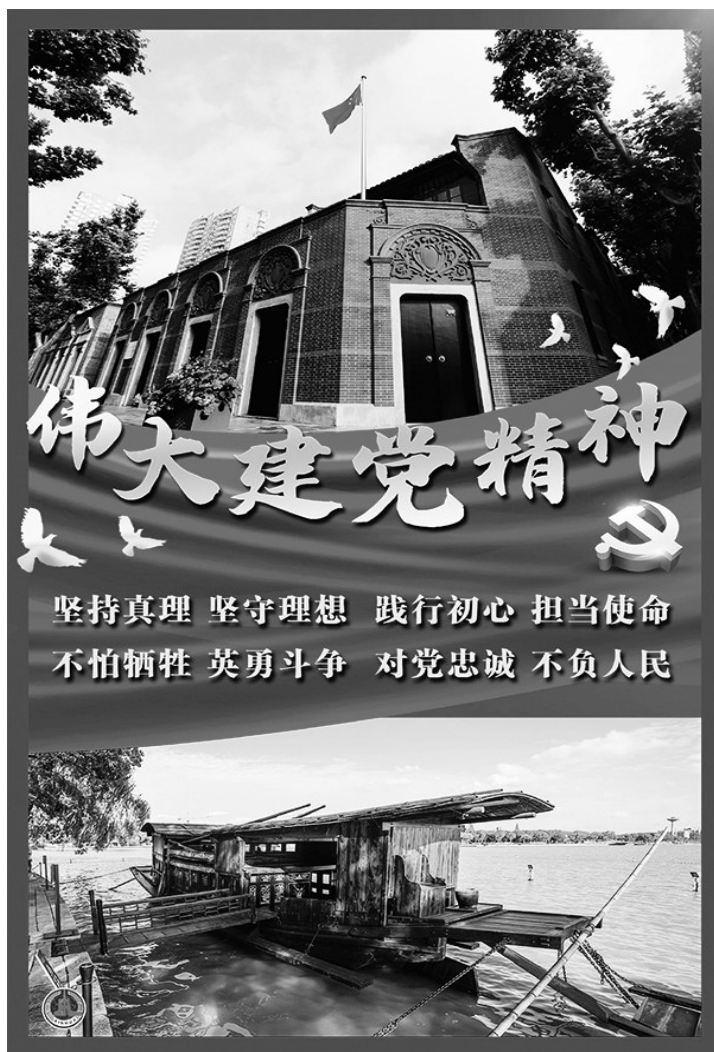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强盛、民族复兴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着难得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鼓作气、继续奋斗,必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决不能丢掉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决不能丢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决不能丢掉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勇气。全党同志要用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滋养自己、激励自己,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不断书写中国共产党人新

的精神史诗。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回望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始终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继往开来，开拓前进，我们就一定能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资料原载于《人民日报》2021年7月19日第1版）



“当代梁山的阮氏兄弟”

——阮迪民革命生涯纪实(四)

卞初阳

高等学府 校长楷模

1977年12月,阮迪民调回兰州,担任甘肃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甘肃师范大学的前身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发端于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迁往西安,1939年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1年再迁至兰州。抗战胜利后,部分师生回迁北平恢复北平师范大学(即北京师范大学),留在兰州的于1958年改为甘肃师范大学,1988年再次更名西北师范大学。因而甘肃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为同根同源,两校校徽采用同一主题元素“木铎”,校训“知术欲圆,行旨须直”既体现了甘肃师范大学的历史积淀和文化追求,也凸显崇尚学术、追求卓越的校风。

甘肃师范大学是具有百年历史的名牌师大,聚集大批资深专家和学者,是甘肃乃至全国各类学科顶尖级人才荟萃的地方,是能人巨匠藏龙卧虎之智库,甘肃师大馆藏有古籍文献10万余册,是全国为数不多的馆藏文化宝

库。阮迪民上任之时,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党中央开始部署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拨乱反正的转折时期,更是阮迪民调离甘肃、被剥夺实际工作权利10年后的首次复出。阮迪民以大无畏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团结带领党委一班人,在樊大畏、鲁夫、向景义等同志支持下,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认真甄别和纠正“文化大革命”以及“左”倾错误造成的冤假错案。阮迪民态度明确,“文革”中把人家搞错的,该平反的平反,该纠正的纠正,还人家一个清白,给历史一个公正。让专家学者放下思想包袱,从极“左”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投身于教学科研之中。甘肃师范大学有百名教师的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历史遗留问题得以解决,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同时,阮迪民狠抓教学科研秩序,建立和恢复科研院所机构,如古籍整理研究所、植物研究所、中国画研究院、敦煌艺术研究所、工艺美术研究

院等,开启了甘肃历史上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系列工程。

1979年,甘肃师范大学美术系,利用师生和校友创作的美术作品,在甘肃省博物馆举办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暨甘肃师大建校40周年的“百花美展”,展出了国画、油画、素描、速写、水彩画、水粉画、书法、篆刻8大门类的438幅书画作品。作品恢弘大气,精彩绝伦,充分展现甘肃省各族人民新风尚和新气象,深层次展现甘肃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工艺美术的积淀。时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政委肖华在阮迪民陪同下参观了展览。肖华书记对“百花美展”很感兴趣,参观时就指示阮迪民说,要依托甘肃师大人才高地和智库优势,把吕斯百、常书鸿、黄胄这些画坛大师聘去当顾问,要加强同省府各职能部门联系和协作,把甘肃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好,并把传统文化工艺美术做成产业化。

在肖华书记的指示和支持下,20世纪80年代,甘肃省就加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力度,至今甘肃省拥有世界文化遗产7处:敦煌莫高窟、锁阳城、嘉峪关长城、玉门关、麦积山石窟、悬泉置遗址、炳灵寺石窟。1980年,甘肃省计委和省轻工业厅牵头,在“百花美展”的基础上拓展成甘肃省工艺美术“百花奖”大赛品牌,将甘肃的夏河唐卡、嘉峪关风雨石雕画、嘉峪关石砚、酒泉夜光杯、敦煌彩塑、敦煌壁画等11

个门类260个民族传统文化工艺美术产品打造成著名品牌,走向全国,远销海内外,形成甘肃经济快速增长新亮点。另一文化保护工程是依托甘肃师大人才优势,由黎锦熙、彭铎、郭晋稀等著名专家、教授引领,以古籍研究所为基地,对甘肃师大馆藏古籍文献进行有计划研究整理出版。那时阮迪民已离开了师大,这些工作虽然不能说是他的功劳,但是他在甘肃师大工作的短短两年时间,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为甘肃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打下良好的基础。甘肃师范大学教职工深深感念阮迪民老校长的恩情。

1982年2月至1984年2月,阮迪民任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校长、党委书记,1984年3月至1985年12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校长,陕西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创建于1934年,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地方党校之一。党校在“文革”期间停办,1978年恢复。阮迪民一如既往,浑身洋溢着一种催人奋进的精神,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很好的组织才能。他结合党中央关于党校建设总目标和总要求,结合陕西省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三年上台阶,五年大变样”的发展目标,提出“政治立校,质量兴校,人才强校”的步骤和措施。“政治立校”就是“党校姓党”,认真贯彻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质量兴校”就是既要把党的思想路线方针

传授给干部,又得把陕西特色资源教给干部学员,初创陕西延安精神教学和陕西传统文化教学两大特色亮点和品牌。“人才强校”就是培养造就高精尖专家学者,并把最前沿成果转化为培训教学内容,提高党校办学培训质量和档次。阮迪民既抓教学科研,又抓行政管理和党校建设,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党校建设服务,使陕西省委党校面貌焕然一新,党校工作出现了崭新局面。为了推动党校科研教学深入发展,1981年,阮迪民主持创办了党校校刊《党校月报》,后改为《理论导刊》。《理论导刊》很快发展成为全国中文类核心期刊,机构用户和读者分布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后来又创办了《陕西党校报》,该报成为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党校报纸。党校还成立陕西干部培训国际交流中心同德国波鸿人民学院和美国乔治亚大学卡尔文森政府研究所建立了国际合作关系。2013年1月21日,《理论导刊》发刊第500期,编辑部和延安干部管理学院联合采访阮迪民老校长。

阮迪民在工作上抓得很紧,一丝不苟,在生活上也保持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从不搞特殊。党校为教职工修建两栋18层的宿舍大楼,规定每平方米1800元,公家出300元,个人支出1500元。党校给阮迪民分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阮迪民坚决不要,仍然

住在80年代的旧楼中。

1985年12月,阮迪民离休后,仍然坚持学习,读书看报,他受聘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党校老年理论协会和老年体育协会名誉会长,并十分关心两个协会工作,积极参加有关会议和活动,阮迪民非常关心党和国家大事,经常关注理论战线上的动向。对理论界某些错误观点和倾向,能及时发现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同老同事探讨端正党风时,阮迪民就提出,党中央常委会下设立两个局——中央执行局、中央监察局,这样执行和监察两权分离,各自对中央常委会负责,有利于遏制腐败之风。

阮迪民主动关心党校发展,联络八位老同志,成立“园林花甲队”承担校园绿化美化管理工作,他坚持每天和同志们一起劳动,先后种植树木花卉5万多株,维护草坪6000平方米,增添名贵花木数百盆,改观党校校园环境,受到党校教职工和学员的称赞,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1989年,在中共陕西省顾问委员会春节团拜会之际,习仲勋和阮迪民两位老朋友的手紧紧握在一起。1992年,阮迪民随陕西顾问委员会团队特地去深圳迎宾馆拜望习仲勋,习仲勋拉着阮迪民的手说:“我现在退居二线了,就要在深圳住下去,在深圳恢复我的健康,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着深圳发展……”习仲勋是将自己亲手培养

起来的深圳特区当成自己的家，而阮迪民的家呢？

叶落归根 魂归故里

阮迪民离休后，愈加关注和思念魂牵梦绕的家乡於潜镇杨洪村。1998年至2010年，阮迪民多次回到於潜镇杨洪村，祭祀父母，会见亲朋好友，重归故里，特别是幼时记忆深刻的地方。大树华盖，蓝天碧水，山高谷深，坡陡林茂，峡谷风景绮丽，丰陵溪九曲回肠。象鼻山、笔架山，斤线潭、亭子巡，马蹄湾，金竹湾，龙王殿，大叶坞，茶叶湾，700亩水田，3万亩山林，沿溪两岸山崖与溪流时聚时离，恰似一幅翠谷山水长卷。

杨洪村的贫穷乡村面貌已焕然一新，凌龙公路直通安徽宁国，甘岭脚水库蓄灌，茶叶竹笋苗木基地遍布山川田间地头，乡间别墅隐逸岱峰树荫之间，绿色生态的农林，茶、竹笋、苗木成为杨洪的主导产业。每每遇上家乡的父母官，阮迪民都会以一个老革命、长者身份向他们殷切建议，要重视三农问题，要振兴乡村经济，要充分利用杨洪的自然生态环境优势，利用杨洪人缘文脉的特色，搞个整体规划，立足长远发展，不能想到哪儿干到哪儿，更不能反复和折腾。

1998年5月，阮迪民第二次回到故乡，也是阮迪民离休后第一次回故乡。回家时，他没有惊动当地政府领

导，只是住住老屋，见见至亲好友，坐在经过简单装修改造的老屋檐下，与阮琴、柏坤、彩法等人聊家常，并去阮家龙坞口重温割草放牛的情景。

2000年10月3日，阮迪民为参加湘湖师范金海观校长塑像落成仪式而提前回到故乡，与堂侄话乡情，探讨阮家阮氏“竹林堂”郡号，商量重修阮氏家谱。

2005年，90岁的阮迪民在孙儿女的陪同下，回到临安市於潜镇杨洪村作探亲之旅，并完成三件事：一是因小学同学周智2004年探寻到在阮家朝山里坞丘阮氏祖先留下的摩崖石刻，并以此写了一篇《寻访摩崖石刻》短文，阮迪民此次回家乡想一看究竟；二是为堂侄阮昌明正在编《阮氏家谱》提供资料；三是整修父母坟墓。阮迪民还写了《九十故乡行琐记》，记述了沿途所见所闻，夹叙夹议，让人读后备感亲切。其中详细记述了阮迪民不顾耄耋之年，在侄儿晚辈陪同下，冒雨探访祖先留下的摩崖石刻的经过。

2008年，阮迪民给新修葺的父母坟墓扫墓，同亲戚晚辈合影。

2010年，95岁的阮迪民第六次回到了故乡杨洪村，感叹家乡不断发生的新变化，对2008年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吴乾坤寄予厚望。阮迪民握着吴乾坤的手说，50年前你父亲代表村里接待了我这个游子，今天希望你能接好你父亲的班，做好特色产业、生态农

宿、文化印记这三篇文章,带领村民走出一条绿色生态农业+生态民宿+文化体验的振兴乡村经济的新路子。吴乾坤对阮迪民前辈的勉励深表感谢,并热忱邀请阮老为家乡留下墨宝,阮迪民挥毫写下了遒劲的“竹都”二字,并注释:“古为军都,名曰八都,今成竹海,堪称竹都。落款九五老人,阮迪民敬书,庚寅八月。”吴乾坤代表乡亲恳请阮老前辈在百年之后,将骨灰运回故乡安放,让杨洪的后人世世代代缅怀。阮迪民当即高兴地答应了。生为革命尽忠,死为父母尽孝,树高万丈,落叶归根。

2014年5月26日,阮迪民因病在西安逝世,享年99岁。按照阮迪民同志临终遗愿:“丧事简办,不收花圈和礼金。”国家主席习近平,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长刘云山,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赵乐际分别以不同形式表示悼念,并向亲属表示慰问。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孙清云,省人大副主任刘小燕、胡

悦等致电或到家吊唁。省委副书记兼党校第一校长毛万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2015年5月26日,也就是阮迪民逝世一周年之际,阮迪民和曹冬焱夫妇的灵骨,在阮迪民儿女、孙儿女的护送下,安放在杨洪村公墓,并根据阮迪民遗愿,不给组织添麻烦,不惊动乡亲,一切节俭,且移灵柩安放骨灰所有费用全部由子女出钱。

阮迪民的青年时代是中国最黑暗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投奔到炮火连天、腥风血雨的抗日前线去参加战斗。那是一条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充满荆棘、艰难坎坷、不惜牺牲生命的道路。他经历了艰险和困难,受尽了磨难和委屈,仍然几十年如一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紧跟中国共产党走,不忘初心,从未放弃在青年时代确定的人生目标,严气正性的生活态度,善良坚强的作风和品行,丰富的人生阅历,光明磊落的精神风貌,是留给后人体悟、效行、继承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为临安区钱镠研究会理事、区作家协会会员)

听我的团长周文江讲那过去的故事

王公民

最近抗美援朝题材的战争电影《长津湖》让我想起了央视大型纪录片《冰血长津湖》。在那个纪录片中,记者多次采访了我的团长——战斗英雄周文江。

周文江,1944年3月参加新四军,194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参加各种战斗140余次,多次立功受勋,获得朝鲜国家三级国旗勋章二枚,全国一级战斗英雄,全国第一、二届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1956年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在2005年8月召开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座谈会和2007年8月召开的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暨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上,周文江还受到胡锦涛主席的亲切接见。

1962年6月,我作为一名学生兵入伍。在杭州留下进行短期集训后,我就被分配到20军59师175团,当营长通讯员。我的同乡好友王建民分配在团部,当团长周文江的警卫员。有一次,我在团部与王建民聊天时,周团长走过来对我说:“小鬼,听口音你好

像不是杭州人吧?”“我从小随父母从苏北逃荒到杭州来的。”他听后笑道:“那我们还是老乡哩。”从此,我们往来较多,他经常跟我们讲他的战斗故事。现将周团长曾讲述的,且我印象极为深刻的两个战斗故事,与大家分享。

潜入机场抓俘虏

那年,杜聿明集团全线崩溃。我们在夏庄附近整顿、备战。按照“即俘、即补、即训、即打”的方针,我连又补充了80名新兵,其中刚“解放”过来的战士就有50余人。为进一步鼓舞士气,我们奖励了有功人员。

打下朱小庄后,我二师六团的指挥所就搬到了这里。朱小庄地势较高,在庄子后面100多米处,有一条宽约10米的河,一座石桥横在河上,河对面是敌人的临时机场。下午一时许,我(指周文江,下同)带着通信员到团指挥所开会,站在高处向机场那边一望,只见机场上敌兵人头攒动,秩序很乱。开完会后,我请示团长和政委,南面机场上敌人相当混乱,等天黑后我想带部队进去,抓些俘虏过来。

团长和政委走到指挥所外,向机场方向看了看说:“这么多敌人,你怎么进去?”我说先带一个排进去试试看。因为我们补充了很多新兵,他们还穿着国民党部队的衣服,我穿的也是国民党的大衣,只要天黑下来,我就能进去,可以抓到俘虏。首长们商量后,同意我带一个排进去试试。随即我回到连队和连长商量,由他带二排到团部附近接应,我带三排潜入敌人机场。

天黑之后,我带领三排很快通过石桥,进入机场的围堤内,这时我想,这么多敌人,我们怎么进去呢?我和三排长商量决定由他带领七班、九班占据围堤,守住桥头,我带领八班摸进机场内。八班有十个人,除班长是新四军老兵,副班长、战斗小组长等骨干都是窑湾镇解放过来的兵,我要求八班全体同志进入机场后一定要听我指挥。

机场里面人挨人、人碰人,非常拥挤。敌人没有怀疑我们,因为我们穿的都是缴获的军服,敌人搞不清楚,以为我们是自己人。我们向里走了100多米,在一块空旷的地方停了下来,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哨子吹起来,然后大声喊:“集合!”敌人不知道我是谁,听到哨音纷纷向我这边围拢过来,一下子集合了50多人,还有8个人牵着马,我交代八班长领他们过桥去吃饭,他们就乖乖地跟着我们的人到了团部。

怎么到了团部就有饭吃呢?因为

我们团有个专门负责俘虏工作的人,早就准备好一桶饭、三盒红烧肉等着俘虏来吃的,50多人顿时傻眼了。一个老兵闷声闷气地问:“这是什么地方?”我们的一个战斗小组长说:“这里是解放军的团部。我是窑湾战斗解放过来的,你们投降吧,共产党部队好得很呢!”这个国民党老兵倒也干脆:“管他什么地方,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饭,先吃饱再说吧。”于是大家纷纷缴枪吃饭。这批一共有56人。

这时,机场东边方向有一大队敌人向我走过来,因为晚上看不太清,八班长继续吹哨集合,我则带通信员朝敌人迎了上去。相互接近十来米,我便高喊:“停止前进!你们是哪部分的?”敌人停了下来,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国民党团长,他问:“你们是哪部分的?”我说:“是自己人。”他说:“我们是十三兵团的。”原来是李弥兵团的人。我接着说:“哦,原来你们也是十三兵团的,派一个人过来吧。”这名团长挥着左轮手枪,趾高气扬地向我走来,走到据我约两米时,我突然举枪对准他的胸膛,说:“我是解放军,这也都是我们的人,你立即命令你的部队放下武器投降吧!”这个团长说:“请允许我向后走几步,叫他们放下武器行吗?”我说:“可以。”这个团长调头向后走,我的枪口紧对着他的后背,他突然一转身,一手抓住我的枪,一手扭住我的大衣,大喊道:“抓到一个八路军土匪,大

家快上来。”这时我看情况紧急，连忙一发子弹出膛，但没有打中他。我集中全力想法脱身，踢了他两脚，并顺势猛地撕开大衣，迅速从大衣中来了个金蝉脱壳。刚跑了十几步，敌人就向我开火了，我赶紧卧倒就地一滚翻到了一道战壕里，恰好战壕里有枪支弹药。我拾起一挺轻机枪，上了一串子弹，向敌人扫了过去，此时敌人不敢前进纷纷卧倒在地，我一边打一边喊：“这边都是我们的人，你们只要投降，我可以保证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都放下武器，到我这边集合。”国民党部队根本无心打仗，听了我的喊话，当即就有部分人表示愿意投降。那个团长则带了一部分人逃跑了。

我从国民党兵中挑选了一个山东老兵，让他把投降的人集合起来。然后我宣布了我军的俘虏政策，叫他们把武器放在地上，朝我们团部方向走去，同时宣布一不准讲话、二听从班长指挥、三保持队形的三条纪律。我们走出机场时，团长和政委迎了过来，一看我们抓了这么多俘虏，非常高兴，这批俘虏有390人。

淮海战役打了65天，歼敌55.5万人，我连参加淮海战役时75人，担任5次突击和主攻任务，一共俘敌2100人，缴获各种武器2000多件。连队里立功受奖的战斗英雄占了一半，被授予“淮海战役大功连”，我个人荣获“华东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冰雪塑群英

如果有人问我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印象，我脑子里似乎只剩下两个字，一个是“热”，一个是“冷”。

说到“热”，一是参战的全体志愿军将士，始终保持着极高的战斗热情。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战斗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挥员、战斗员和工作人员，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创造出了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辉煌业绩，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其中立三等功以上的英雄有30多万名，立集体三等功以上的单位有6100多个。其中杨根思、黄继光、伍先华、邱少云、孙占元、杨连第、杨春增、胡修道等八位为特级英雄，获得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的“共和国英雄”光荣称号，并获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各一枚。二是当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在全国开展得如火如荼。各界群众代表组成的各种赴朝慰问团，把志愿军指战员的心都融化了。1951年6月，我因要去柏林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回到北京时，看到大家都在参加爱国募捐运动，我和三十八军的郭忠田同志真是感动极了。

说到“冷”，我们当年在朝鲜的狼林山上、长津湖畔感受到的冷，真的是能让人记上一辈子。头上大雪飞舞，脚

下积雪成冰,西风过处,那种顽固的、浸入骨髓的寒冷,不亚于任何一种“酷刑”。在我们英勇牺牲的战士中,有的身上既没有中弹,也没有刀伤;有的虽然负了伤,但并没有伤到要害,那么杀死他们的凶手是谁呢?是严寒!是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把这些炽热的血肉之躯,铸成了冰冷的英雄群雕!

在长津湖战役中,当我们的战士与美军浴血奋战的时候,另一个“敌人”——严寒,也在悄悄地侵害我们的肌体,削弱我们的战斗力,以及夺去我们的生命。

11月30日,我第二十七军调集两个师5个团的兵力围攻新兴里的美军第七师三十一团,我第八十一师二四二团五连奉命,在敌人撤离逃途中伏击敌人。战斗打响后,却无人站起来冲锋。后来打扫战场时发现,整整一个连的干部战士全都冻死在简易的掩体中,人人手执武器,保持着冲击的姿态,怒目注视着前方,却全部成了一座座晶莹的冰雕。一百多人的连队,仅掉队的战士和传达命令的通讯员幸存。

12月3日,从柳潭里突围出来的敌人,与被困在死鹰岭山沟里的残敌会合后,向我一七七团一营坚守的死鹰岭阵地发起猛烈攻击。由于一营在围歼美军的战斗中伤亡很大,当时在死鹰岭1519主峰坚守的,是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但他们英勇奋战,将收集来的手榴弹铺天盖地地投向美

军,打垮了敌人8次进攻,阵地上的积雪都被烤化了。冷风一吹,一营剩下的60多名干部战士全部被冰冻在地上,动弹不得。后来上级命令据守一线的部队撤下转移,被冻在1519高地的这60多人撤不下来,第五十九师的戴师长、何政委亲自组织干部、战士,上山撬开冰块,才把他们全部背了回来。坚守阵地毫不动摇的钢铁汉子们,却在战友的背上,一个个泪流满面!

12月4日,我第二十军第五十九师一七五团组织股长伍一,带着担架班登上激战过后的1419高地主峰,看到有个坑里隆起个柱形雪堆,但又不像雪堆。他走过去扫掉表面一层积雪,立即露出一个人形来,仔细一看,正是五连指导员朱宝珍,只见他穿着一件两斤重的薄棉衣,坐在没有挖好的散兵坑里,手里紧握着打开了保险的手枪,一双眼睛注视着前方。从他脸上的神态可以看出,他在迎击敌人的进攻。只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体在迅速被冻僵,血液在迅速凝固!

这一个个悲壮的故事,一尊尊晶莹的雕像,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真实写照。他们不论处于多么恶劣的环境,在战斗中总是恪尽职守、英勇杀敌,即使冻死在战斗岗位上,也依然保持着军人的尊严。

(作者为临安区总工会退休干部)

杭氧的前世今生

李东升

说起“杭氧”，老杭州人都知道说的是杭州制氧机厂（简称杭氧）。自从2006年杭氧与临安签约后，连临安人也慢慢地知道了，尤其是在青山更是家喻户晓，知道杭氧是从杭城迁来生产制氧机的大工厂，还有不少青山人也有幸到杭氧这个大工厂里当了工人，但又有多少人知道杭氧的“前世今生”呢？

前世艰苦奋斗，为国争光填空白

据载，成立于1917年的浙江陆军一师军械修理工厂，后几经战乱演变为旧中国浙江省保安司令部所属的力余铁工厂。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市人民政府接管了力余铁工厂。1950年8月1日，力余铁工厂与浙江汽车修配厂合并，改建为浙江铁工厂，这就是杭氧的前身，至今已走过百年风雨历程。新中国成立后，开启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篇章，也赋予了杭氧新的生命——1950年8月1日，被认定为杭氧的建厂日。

当时，浙江铁工厂厂房分布在杭城劳动路和中山南路，厂部办公室设

在劳动路99号，有职工453人。刚开始，厂里只能制造一些简单的铁木结构茶叶机、中耕机等小型机械设备，由于原材料匮乏、局部破坏活动时时有发生、投机商兴风作浪，想要自己制造机器，遇到的困难超出想象。没有设备，就用土办法来替代；没有经验，就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浙江铁工厂就这样坚持着生产。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51年4月，中国第一台自主制造的麻纺机诞生，成为在浙江铁工厂所有人的骄傲和继续向前奋进的动力。

1952年，一次特殊的全国性机械行业工作会议，成为杭氧发展史上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

当时，整个中国没有空分设备制造业，上海、青岛等少数几个沿海城市所使用的制氧机都是依赖进口，尤其当年抗美援朝战争人民空军对制氧设备有紧急需求。为此，1952年8月，国家重工业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工矿机械会议，全国各地80余家单位的12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浙江铁工厂由时任厂长钱祖恩和厂党委副书记张光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布置

空军用移动式制氧机、充氧车和高压空气压缩机等产品的制造任务。国家重工业部根据国防、机械、冶金、化肥等部门对制氧机的迫切需求提出：“中国要有自己生产的制氧机！”考虑到华东沿海地区的工业基础较为雄厚，国家拟将制氧机安排在华东地区生产。

参加此次会议的华东各厂主要负责人大多没有接触过制氧机，谁都不敢在会上轻易“请战”。钱祖恩也只是在上海见过一套从加拿大进口的92立方米/小时制氧机安装过程，对此类设备的原理和机组情况还算“熟悉”。如果仅仅凭着一次接触，就要接下生产制氧机的重任，风险很大。但是，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种振兴中国工业的强烈愿望，在钱祖恩厂长心头油然而生。作为一名机械专家，他富有前瞻性地看到了制氧机行业的未来——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这必定是个大有发展前途和作为的行业。于是和一同参加会议的张光商量后，钱祖恩在会上大胆表态，浙江铁工厂接受任务！一语惊四周，所有的代表把吃惊的目光投了过来，实力更雄厚的大厂代表更是难以置信，连上海都不敢轻易表态接受的任务，杭州居然敢接？

敢接就敢做。1952年，当年接受任务、当年全厂动员、当年组织专班、当年动手试验，经过大家群策群力、齐心协力和刻苦钻研摸索，浙江铁工厂真的在当年年底就成功试制出充氧车

和高压空气压缩车。1953年8月，浙江铁工厂更名为国营杭州通用机器厂，不久便全面开始了试制成套制氧机的准备工作。当时的杭通人深知，成套制氧机的生产技术要求 and 工艺流程要比以往厂里生产过的机器要复杂得多。但决心已下，纵有千般磨难、万般挫折，也要为中国制造“制氧机”闯出一条新路来！

1954年，先开始仿造试制每小时产氧30立方米的小制氧机，经过夜以继日的不懈努力，到翌年12月，设备试制工作全部完成就绪，接下来就是关键的试车阶段，杭州通用机器厂每一个职工的心都绷得紧紧的。

1956年1月1日，试车正式开始，全国人民都在期待着这令人激动的时刻。杭州通用机器厂的领导和相关技术人员、工人早早来到了试车现场，医务救护和警卫人员也在现场待命，以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前期准备工作都处于紧张而有序的状态。

制氧机的各个部分组装完毕，手工操作的吊车用铁链将卧在地上的精馏塔慢慢竖起来。5度、10度、15度……随着精馏塔慢慢地直立起来，大家的目光也都跟着向上移动——“砰”的一声巨响，当精馏塔竖到30度时，忽然倒了下来，外壳摔坏，里面的机件也撞坏了。这突如其来的意外，让在场所有人的心都“咯噔”了一下。幸好设备试制时多做了一只备用的，工人们赶

紧把备用精馏塔拿来再次吊装,这次总算是有惊无险。

制氧机终于开动了。大家全神贯注地看着液面指示器,如果水柱上升就意味着要出氧了。可等呀等呀,液面指示器始终没有动静。厂领导赶紧组织技术人员和工人开起“诸葛亮”会议,对整套设备进行全面分析检查,就连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也不放过,不一会儿,问题就找到了。修好,再试车!这一次,氧气终于出来了!

然而,欢呼声刚响起,又传来坏消息,氧气纯度没有达到设计标准要求的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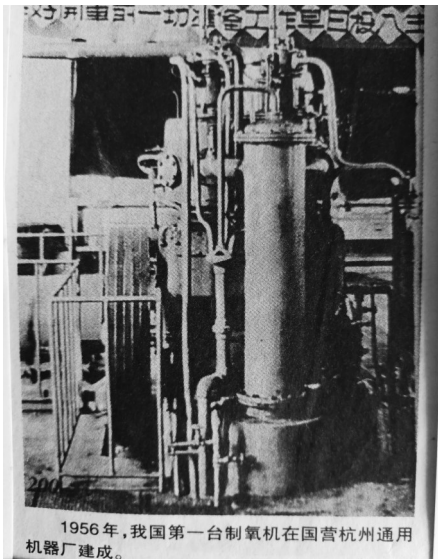
为了尽快找到症结所在,主任设计师陈逸樵和技术人员、工人们把铺盖都搭在了试车现场机器附近,为的就是抢时间、赶速度,把精力集中在查找问题上。经过再三仔细检查、调整和改

进后,重新试车定在1月3日进行。

那天,大家的心再一次揪紧,在紧张有序、小心谨慎的试车过程中,当化验员报告“氧气纯度达到99.2%,产氧量也符合设计要求”时,全场欢呼声沸腾:“我们终于成功了!”杭通人如愿以偿,第一次填补了我国自主生产制氧机的空白。此后,30立方米/小时制氧机开始在杭州通用机器厂投入小批量生产,并在1956年12月还试制完成每小时产液氧12升的军用制氧车。

1957年,经国家建设委员会批准,杭州通用机器厂迁址杭州市东新乡新凉亭(现东新路),并于1958年12月更名为杭州制氧机厂。杭氧正式成为新中国最早形成批量生产空气分离设备的专业厂家。1960年5月,杭州制氧机研究所在该厂成立,开始了中国气体分离设备工业的独立研究和产品开发,从而奠定了我国制氧机工业的基础!

其实,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都一直关注着杭氧的发展。早在1958年4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第一次视察杭州通用机器厂;时隔两年后的1960年6月23日,朱德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身份第二次视察杭氧;到1964年1月22日,朱德委员长第三次视察杭州制氧机厂时,亲笔题词“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朱老总对杭氧充满殷切希望的题词,给了杭氧人继续努力奋斗的信心和力量。



1956年,我国第一台制氧机在国营杭州通用机器厂建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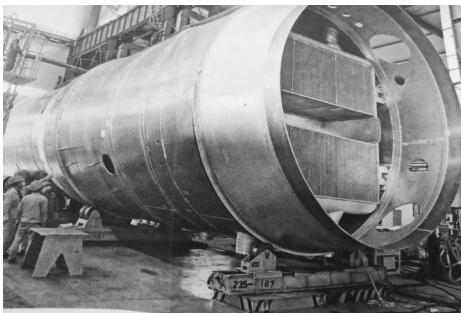
今生奋力拼搏,争创世界第一流

杭州自2002年起实施“工业兴市”战略以来,加快推动了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大力推进市区工业企业搬迁,为“退二进三”“优二兴三”创造新空间。按照“区域集中、产业集聚”的原则,一批发展前景良好、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向萧山、余杭、临安、富阳等区县(市)实施搬迁。此时,杭氧作为装备制造企业,从一个侧面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技术水平,彰显的是发展硬实力,在“工业兴市”战略指引下,又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新时代”。

杭氧这位国之重器负重前行的“硬汉子”,自从2006年与临安正式签约后,历经两年零九个月,于2009年全面完成搬迁和安装,以最快速度建立了新的生产线。

由于当时6万等级以上空分设备国内企业还没有开发出来,经常在关键时刻遭受国外市场“卡脖子”,为了彻底扭转2007年以前中国高端空分设备靠进口的局面,杭氧人在新的创业热土上,马不停蹄、克难攻坚研制空分设备,至今为冶金、石化、煤化工、化肥、航天航空等行业提供了4000多套设备,遍布全国并出口到美、欧、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0年,杭氧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经济实力。近年来,杭氧人充分利用在空分设备设计制造的优势,大力进军工业气体领域,实现产业链进一步延伸,目前已在国

内投资设立40余家专业气体公司,装机制氧总量突破180万立方米/小时,发展成全国最主要的工业气体供应商,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空分设备制造企业之一,年空分设备制造产量多年来位居世界第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4月26日,杭氧与神华宁煤签署6套十万等级空分设备设计、供货和服务合同,这个项目无论在合同金额、空分规模、还是技术复杂性方面均为世界第一。2017年3月15日,神华宁煤首台十万等级空分设备开车成功,之后专家对6套空分设备进行评审,认为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不仅是杭氧企业自身创新的大突破,更是国内重大装备国产化的又一次重大新突破,说明我国在这一领域能与国际空分巨头在同一赛道上一较高低。如今提到杭氧,很多人的脑海里还会蹦出一个词——“大国重器”。2018年3月1日,杭氧为神华宁煤打造的6套十万等级空分设备登上中央电视台《大国重器》第二季第四集《造血通脉》栏目,向全世界庄重宣告,在临安青山湖科技城的杭氧,

有能力生产中国的“大国重器”。

今年是党的百年华诞,杭氧人拼搏创新的精神不负众望,又在今年5月27日再次荣登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硬核“国潮”中国造》专题,讲述杭氧公司近年来不断加强自主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成为中国制造新“名片”的故事。自搬迁到临安的12年里,在临安区青山湖科技城东环路99号,杭氧新厂区空分车间内,弧光四射、机声隆隆。杭氧人从未停下脚步,不断加快了创新突破和超越经过多年攻关的技术,掌握了40多项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空分设备核心技术,并从“硬汉式”单一制造,转型为“刚柔相济”的服务型制造,从空分设备制造延伸到工业气体领域,真的像是“牵着奶牛卖牛奶”,将工业气体打造成新的产业增长极,这已成为杭氧制造高质量发展的大势所趋。“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和积累。”杭氧党委书记、董事长蒋明一语道出了企业基业常青的要诀。当前杭氧最大空分设备等级已达到了12万立方米/小时(氧),已经成为我国空分领域当之无愧的领跑者,更是全球空分设备制造行业中的“大哥大”,处于一流领先水平。

今年10月16日0时23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神舟十三号载

人飞船,并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们将在太空驻留180天,氧气是必须品之一,而从神舟一号开始到神舟十三号,宇航员们所需的氧气都是由杭氧的液氧液氮设备所生产。目前,我国四大卫星(西昌、酒泉、文昌、太原)发射基地都使用了杭氧的装备。每当国人看到我们的航天员成功上天而兴奋激动之时,杭氧人却有着另一份特殊的自豪感。

回望青砖墙、高烟囱、绿皮火车头……穿行在东新路旁的杭氧老厂区,犹如走进一个时光倒流的异度空间,那些斑驳留痕的工业遗存,似乎在向你讲述那段“杭字头”品牌风光无限的峥嵘岁月。

百年老厂百年沧桑的历史再次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像杭氧这样的装备制造企业,才能从困境中走到自主创新,实现从追赶者到超越者的角色转变,一次次打破国外垄断,成为举世闻名的国之重器。

“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潮起潮落,望未来任重道远。”今天的杭氧人更是紧紧把握住时代脉搏,积极投身于波澜壮阔的改革洪流,勇立潮头,敢于担当。我们坚信,胸怀大气行天下的杭氧人,在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中,必将牢记初心使命,续写奋进新华章!

(作者为区经信局退休干部)

“七·五”洪水三烈士

郑明曙

1969年7月5日,於潜地区倾盆大雨,山洪突然暴发。几小时内,雨量达188毫米。站在高处,远眺於潜附近的各块山峰,似乎成了大海中的孤岛。天目山麓几十股洪水夺路而来,在於潜北边的双溪口汇合,越过堤岸,冲上田坎,湮没桑树顶,涌向金家村。700多人的村庄、国营纸厂被突然袭来的洪水围困,生命财产处于万分危急关头。

紧急关头,於潜区校教师贾志伟,红卫机械厂工人徐松宝、姜真,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赶快抢救人民生命财产”。

贾志伟老师第一时间跑到教师宿舍前,高声呼叫住在地势较低处的老师,让他们抓紧时间向高处转移,然后快步向金家村跑去,向金家大队革委会主任李根树报告洪水险情。第一个冲到地势较低的杏花村,开展救人救物。他把160斤重的孙余太老人背到安全处,将十多个小孩带出危险区,一路上嘱咐、叮咛:“你们跟着我的脚印走,不要踩空”。

红卫机械厂徐松宝,见水势凶猛,

立即回厂打起紧急集合铃,把年轻力壮的男同志组成抢险队、接待组。他冲锋在前,带领一批工人,哪里最危险,就冲向哪里。他帮助金家村叶美珍抢救财物、推车子,并护送老年人、妇女、小孩脱险。

女职工姜真,主动来到洪水急流处,有人劝她:“女同志不要去,危险!”姜真倔强地说:“救人要紧!男同志可去,女同志也能去!”她把自家的仅四岁和六岁的小孩倒锁在家里,然后跑去为金家村村民夏樟凤背棉被、拉小孩。由于路况不熟,一脚踩空,跌入水坑,爬起来后,还笑咪咪地说:“不要紧!快走!”

洪水铺天盖地而来,树木、沙石横冲直撞,冲击着骆驼桥。这时,於潜纸厂墙外,有个五六岁大的小孩,被围在洪水中号啕大哭,慌乱奔跑,眼看要被洪水卷走,贾志伟老师猛冲过去把他背了过来……

洪水还在继续疯涨。骆驼桥上还有十多个人被困,抱着一根电线杆,情况紧急。徐松宝明白,这根电线杆一旦倒塌,电线落水肯定要伤人,于是赶

紧去镇上拉电闸。他与姜真到了村口,然而通向镇上的路已被洪水阻断,洪水汹涌,恶浪滚滚。“只有冲过去,才能切断电源。只有拉掉电闸,才能确保安全!”但水势越来越急,洪浪越来越高,突然一个巨浪把姜真卷入了洪流。徐松宝见姜真被洪水冲走,连忙丢掉手上的绳子,冲入洪流去救姜真。不料,无情的洪水实在过于凶猛,瞬间又把徐松宝一起卷走了。

“姜真、徐松宝被洪水冲走了,快救人!”在万分急促的呼救声中,只见贾志伟疾跑而至,振臂一喊:“我去!”迅即扑向急流。紧接着,商业系统的杨立升也紧跟而上,投入了救人的行列。大家一次次地把绳子用力甩到他俩的身边,杨立升终于接住绳子,将绳子缚在一棵大树上。杨立升让贾老师先走,而贾老师却说:“不用管我,你先上去,我会游泳,不要紧。”这时上面有人喊:“危险,树要倒了!”话音刚落,拴绳子的那棵大树被洪水冲刷得连根拔起,旁边的大树也纷纷倒了过来,重重地压住了贾志伟,在湍急的洪峰中一

下就被洪水吞噬了。

姜真、徐宝松、贾老师,为了抢救人民生命财产被洪水冲走的消息即刻在於潜不胫而走。大家焦急万分地沿着天目溪下游寻找、呼唤。下午三时,在南门畈稻田里,找到了姜真、徐宝松的遗体,但始终未见贾志伟老师的踪影。人们一直寻找,直到下午四点多钟,人们才在贾老师落水处不远的一个小池塘里发现了他的遗体。他大半个身子都被泥沙覆盖着,嘴鼻耳内充塞着沙土。人们围着圈,噙着泪水,呼喊“贾老师,贾老师!”锥心泣血的呼唤,终究唤不来贾老师的回音。他不仅是个英雄,巍然屹立,也是一支优秀的红烛,爱岗敬业,滴滴汗水诚滋桃李芳天下,点点心血勤育英才泽神州!

姜真、徐宝松、贾志伟三位英雄,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不怕牺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风范,将永远闪烁出迷人的光辉!他们的英雄形象,将永远刻印在於潜人民的脑海里!

(作者为《於潜镇志》主编)

古建筑里的忠孝传奇

潘根春

中央电视台四套《国宝档案》曾经播放了《古建筑里的忠孝传奇》，介绍临安区清凉峰镇杨溪村的孝子祠和孝子陈斗龙的故事。

孝子陈斗龙

陈斗龙，字南仲，生于至元二年（1265），卒年不详。其父天泽，妻盛氏不育，后去钱塘县清湖再娶王氏，一年后生一男孩，取名斗龙。斗龙未满周岁，王氏被盛氏赶出家门，回钱塘娘家。因避“徽寇”作乱，一家人避居在山中，山中湿气重，生活艰辛，天泽因此得病。当时，斗龙才十三岁（虚岁），能煎药熬汤，服侍父亲，并祈祷上苍，愿减自己的阳寿让父亲多活几年。后父不愈身亡，不久盛氏也生病去世。斗龙悲通欲绝，孝心感动上天，一群乌鸦在他“孝庐”上飞鸣三天三夜。

斗龙勤奋好学，又有孝心，被推荐担任温州宗晦书院山长。启程前，有人告诉他，盛氏不是他的亲生母亲，亲生母亲王氏在他不满周岁时被赶出了家门，去了钱塘娘家。斗龙听说大惊，

泣不成声，当天就与妻子告别前往钱塘寻母。到了钱塘，没有找到母亲，有个老妇人告诉他，王氏已嫁到江东去了。斗龙渡江去江西上饶、安徽广德、淮安、宁国等地寻找，往返跋涉，历时六年，终于在江西省永丰县礼贤镇找到了白发苍苍的母亲，王氏已是施氏家室。施氏同情他们母子，让他们母子团聚。斗龙将其母亲带回义干村不久，遇到“徽寇”作乱，斗龙背母亲到百丈山避难，让妻子紧随其后。刚到山脚就碰到了“徽寇”，“徽寇”要杀他们，斗龙把其母安置在平地，对他们说：“壮士，我幼年不知母亲，六年终于寻得母亲，如今摊上这事，我和妻子死了并不遗憾，可是有谁去赡养我的母亲呢？”陈斗龙的这一举动也感动了“徽寇”，他们嘀咕了一阵，放走了斗龙一家，并对手下说：“以后不准到这山里来，以致惊动了孝子及乡人”。斗龙的孝心、孝行被传为佳话。祁阳县尹章硕公闻之，奏明皇上，皇上深受感动，封为“孝子”并御题“孝子”二字，赐直匾一块，在斗龙故里建孝子祠。“孝子”直匾毁于“文革”。

斗龙有三子，龙一、龙二、龙三，龙三次子忠曾受应天府。斗龙葬在何处，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是葬九都山虎，二是葬义涧山，三是葬一都西晚庄。陈斗龙夫人姓凌。

御赐直匾孝子祠

元朝陈斗龙寻母事迹传为美谈，当时昌化县令敬陈斗龙为贤绅。斗龙卒后又以乡贤之礼待之。其事迹和操行为湖南祁阳县尹章硕递具文上报朝廷，之后由昌化县孙国寿记录上报朝廷，钱塘县名儒胡长儒作《陈孝子传》并按语。明嘉靖帝继位，倡导“孝悌”，颁旨恩诏天下，敕封斗龙为“孝子”，御题“孝子”二字，赐直匾一块，立庙建孝子祠，永树风范。



孝子祠正门

孝子祠始建于明朝初期，当时规模较小，称“陈庙”。明中叶，庙圯，庙地被富豪侵占，万历三十一年(1603)陈灼公捐田20余亩，复其旧址独建，1662年毁于火。

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裔孙达德

捐田3.5亩，奖粥捐田2亩，率子侄拓地建成寢室，并与众议重建中堂，示告竣，二公相继去世。雍正十年(1732)瑛公、廷魁公扩建于寢室前更造五楹，后因风雨剥蚀，久之有倾颓之患。

乾隆二十五年(1760)皇上御重建祠宇，裔孙有惠、振学等人会众酌议，于庚辰二月落成。咸丰辛酉(1861)孝子祠毁于太平天国战事。同治乙丑年十月十旬(1865)谌公召集各公派商讨建祠，各派意见不合，至庚午年(1870)谌公再次召集各派首，详谈吾族孝子公德行，自世以来实属罕见，吾后裔孙一定要把孝子公的事迹弘扬于世，再次重议建祠，达成共识，阅六寒暑而告厥成功。

孝子祠的建筑结构是由门楼(前进)、中堂(中进)和寢室(后进)三部分组成，高10米有余，宽近18米，深42米，占地面积739平方米。整个建筑有96根圆柱，画梁雕栋，宏伟壮观。屋柱下的花岗岩石礅做工精细。门楼有两道门，第一道是木条子拼成的栅栏门，正门头顶上的大梁上悬挂着明嘉靖元年(1522)敕封的“孝子”直匾，它的四周雕刻着龙凤图等。两旁的屋柱上按一对木雕狮子。第二道门是用杉木做成的大木门，门板上有秦叔宝、尉迟恭的门神像，青石户槛粗而大，两端压着一对青石石鼓。门楼柱子镌刻着楹联：廟貌燃鄰韓墓，孝思绍虞廷。



孝子祠中进

中堂是集会,祭祖的地方,正中照壁上悬挂着“永锡堂”巨匾,匾有4米长,1米宽。明堂边柱子上的楹联:源溯颖川千百派支流可合,宗开义润亿万年厚泽均占。



孝子祠天井

后进中间,有孝子公陈斗龙的“龙庭”,摆放着孝子公及迁昌始祖实公以

及尚二公、龙一、龙二、龙三公的牌位,供大家朝拜。后进柱子上也有一楹联:汉室名儒弟,元朝孝子家。

祠堂门前是一个用青石铺就的祠堂坦,坦前并排放着四个大花岗石旗杆礅,中间插入大杉木旗杆。



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石碑

2003年义干村委对孝子祠进行抢救性修理;2006年又进行一次大修,基本恢复原状;2006年4月临安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1月,临安市文物管委会核定孝子祠为市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1月,省政府公布其为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作者为昌化职高高级讲师)

实践出真知

——记青山民间艺术团出国访问演出时的翻译

冯益民

2017年8月14日至9月2日,临安青山民间艺术团一行32人(据说当时是国内唯一派出去的民间艺术团队)应邀参加了捷克国际民间艺术节演出。其中有1位来自中国文联,1位来自中国舞蹈家协会,1位是省群艺馆(现文化馆)的退休老师,还有临安市文化局、文化馆、青山湖街道的分管领导及26位演职员,我担任翻译。为期22天中,我们去了7个城市和乡村,一共演出了27场次。

出发前,市文化局的领导问我,你英语日常用语都会说吗?我笑了笑,回答说,大概会一点。当时心里在想,英语是一门语言,涉及到方方面面,没有边际。一个靠自学的人,恐怕他一辈子也不敢吹牛。凭借自己几十年的群众文化工作,我大致构思了可能遇到的问题,并请教了在联合国工作的青山人——陈忠良先生。通过邮箱,我主动联系了捷克国际民间艺术委员会的Jamila(雅米拉)女士,并将信件的意思翻译给临安文化局领导作为参考。通过捷克民间艺术组委会,我又

联系上了中国驻捷克共和国大使馆的张玉兰女士。这样一来,出国的行程心里就有底了。

飞机到达捷克后,来接机的翻译是一位年轻的姑娘Ivana(伊凡娜),手里举着艺术团名字。我们碰到的第一个出行难题是道具箱太大,规格超标。我们坐了13个小时的飞机,已经非常疲惫,而机场工作人员却不让道具出关,无论怎么和他们解释,就是不肯放行。好在大使馆的张玉兰女士准时赶到机场,她让我们所有人乘车前往目的地,由她留下负责处理道具。我们到达目的地不久,道具也随即到了。



第一次正面交锋是在舒贝尔克市

艺术节组委会办公室,我和导演吴露生老师,还有翻译共3人前往接受任务。组委会负责人是个中年妇女,态度有点傲慢,讲的什么语言我半句都听不懂(据悉,捷克历史上曾被德国和俄国占领过,讲一种德语和俄语的混合语——斯拉夫语,而年轻人讲的又叫新斯拉夫语)。翻译伊凡娜一句句向我转述。谈的时间长了,内容多了,不仅我记不住,导演也有点迷糊了。回到宿舍后,我设计了一张表格,将接下来的每一场演出活动包括起床时间,早餐内容、出发时间、乘车方式、演出地点、参演曲目时长、上场次序(有12个国家的民间艺术团队一起演出)、中晚餐用餐内容、回程时间、其他要求等写在表格上,让翻译逐个问清楚,然后向导演和领导汇报,免去翻译那些重复内容。令人十分感动的是,中国驻捷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霍玉珍女士专程赶来,参加第一场中国文化日的演出,并为艺术团送来了国旗。

我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居然是想不到,也不曾学到过的单词。由于吃的都是奶酪,鸡腿,面包等中欧主食,几天下来,有个女队员悄悄和我说,她便秘,让我去问翻译怎么办。我从1978年1月1日开始跟随浙江人民广播电台自学英语,先后3年。后来又参加了1980—1982临安电大第一届英语单科学习,以97.5分的成绩拿到结业证书。2003年又自考拿到了全国公共英语4

级证书(最高5级),但是近30年来,这个内容从来没有学到过。我去找组委会设置在活动场所的临时医务室,用我自己的方法(意思只能吃,不能排),和医生说明了情况。一位年长的女医生拿出一粒开塞露,握在手里玩笑着和我说:“这是捷克人民送给中国艺术家的礼物。”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演出,有女队员卫生巾用完了,要我问翻译去哪里买。卫生巾我也没学过,只能理解成“女士每月护理用品”,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演员的伙食,我经常会和翻译去食堂交涉。上场演出时我是台上的舞龙队员,在第三把位。经常会因为舞台太小,直接在地上翻滚演出。台下是摄影和摄像师。平日里遇到所有与队员有关事情,包括兑换货币,购物时的讨价还价,32个队员的吃喝拉撒等要求,我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晚上回到宿舍,嗓子已经沙哑,有队员为我炖好了中药,让我吃下去,说你是我们全团的喉舌。常常是顾不得演出后湿透了的衣服,处理完杂事后先和衣而睡。半夜醒来,傅贤军书记为我泡好了快餐面,让我起来吃夜宵,两个人还要讨论当天的报道,挑选照片,因为国内省市媒体都在等待我们的邮件。

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8月20日下午。我们驱车3个多小时,到达和波兰交界的叶塞尼克市政厅去演出。到叶

塞尼克市政厅门口已经是下午6点多了,现场等候的观众人山人海。我们被安排在第一个出场,因此其他10多个国家的艺术团都在等候我们上场。我们一行却被告知没有安排晚饭,要等演出结束后回到宿舍才能用餐。队员们四处找零售店,但是捷克人的习惯是为了观看演出,早在下午4点半就关门了。我估计要到晚上11点左右才能回到驻地用上晚餐,这怎么行?一股无名的恼火在我心中产生。我和傅贤军咬了一下耳朵,招呼队员收拾道具上车,宣布不参加演出以示抗议。急坏了的翻译一边哭一边不停地向我解释,是她没有对接好。双方僵持了大约20分钟,最开始接待的那个组委会女负责人过来和我说,是不是因为肚子饿,不高兴演出,她可以想办法为我们寻找吃的。她还说,现场那么多队伍都在等着我们上场,他们也一样要演出结束后才能回驻地吃饭,为什么只有你们提出异议,并且问我要不要联系大使馆。一听这话,我更加恼火。我说:“我们来参加捷克的国际民间艺术活动,有义务参加演出。但是这样的安排,表明组委会不尊重中国人的习惯,我们没有义务饿着肚子演出。你要联系大使馆,随你的便!”其他国家艺术团头领也围过来,也有记者问这问那,因为这相当于罢演,有点严重。北京来的几位老师害怕我们这样僵持下去会产生国际影响。我朝他

们看了一眼,根本不去理会。我们没有上场,现场观众和其他国家的艺术团都在等着我们的决定。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翻译又哭丧着过来和我商量,能不能尽快上场演出。我和傅贤军商量后对翻译说,今晚我们可以上场演出,但是没有第二次!回到驻地,食堂准备的饭早就凉了。因为太迟,工作人员也在抱怨,翻译更是和他们自己人吵开了架,我们的伙食当然也没法下肚。组委会第二天为我们换了翻译,在克鲁普基市政厅广场演出结束后,还为我们准备了鸡尾酒、水果、纪念章。那种弱国无外交的感觉我们算是体会到了。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第一场演出还没上场时,我们一群人在舞台后候场。这时候一个三脚架啪嗒一声在我左侧放下,然后一个话筒对准我,还没来得及听清楚那个女的说什么,经验告诉我她是要准备采访的。我随即和那位女记者说,我是翻译,要让傅贤军(分管领导)接受采访。那个记者连说三个No,意思要我直接回答,她再次复



接应捷克电视台采访 2007.08.28

述了她的采访要求。这是我这辈子不曾碰到过的事,我立刻反应到这是件比较严肃的事。几秒钟内,我概括了一下,向她介绍了这次中国民间艺术团带来的节目内容,形式,可看性等,特别强调了这次带来的是欧洲人没有看到过的龙可以变成狮子的表演形式。第二天早上,大使馆给领导打来电话,说捷克国家电视一台昨晚播出了采访冯老师的视频,说我讲的很好,很到位。

回国途中的飞机上,北京来的老师说:“冯老师,我们都不懂英语。在捷克的22天时间里,我们最佩服的是,捷克先后派来的5个翻译,他们有的用字典在和你交涉,而你却什么都没有。”

(作者为原青山文化站站长,副研究馆员,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管乐学会会员,临安首届“德艺双馨”文化人)



深山英冢

汤向龙

1986年清明节,我在马啸小学读五年级,许绍志老师计划带我们去木勺坞祭扫烈士墓。遗憾的是那年清明大雨,出于安全考虑,就取消了去木勺坞祭扫烈士墓的活动。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想知道木勺坞里是否真有一个烈士墓,埋葬的是哪个年代的烈士,他们为什么会牺牲在那个荒僻的山坞里……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牺牲在路上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战士墓。1934年12月初,寻淮州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浙皖山区时,在清凉峰镇的侯头村与国民党安徽保安团赵青海部激战,红军牺牲了18人,但英勇的红军歼灭了敌军50余人。

2021年清明节前夕,我找到了早已退休的许绍志老师,提起三十多年前的这件事,七十多岁的许老师热情地去帮忙打听烈士墓的具体位置。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寻访烈士墓,令老人十分感动,老师拍着小腿,遗憾地说年纪大了,腿脚不中用,不能亲自带着我去深山里探访了。问了几个知情人,也因为年纪大了,不能跋山涉水,红军烈士墓的具体位置,现在也已经很模糊了。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很是失落,但我没有放弃,继续向清凉峰镇当年红军转战路线上的村民们打听。在区文联副主席陈利生的帮助下,终于在清凉峰镇林竹村找到了几个知情人,也都已经都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其中一个老人说,十年前村民们自发到村后的梓棚坞里,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无名烈士墓进行了简单的修葺,并树立了墓碑。由于烈士的战友们是在匆忙行军的路上草草掩埋了战友的遗体,没能留下战友的任何信息,而他的战友们,大部分也都牺牲在后面的行军路上,所以林竹村的老百姓们对烈士的详细信息一无所知,包括籍贯、年龄、姓名。烈士牺牲在梓棚坞八十多年来,时常有林竹村的老百姓前往深山扫墓,所以烈士墓一直未被荒废,并被清凉峰镇林竹村人民主动修葺。在此,我们应当感谢林竹村村民,他们虽未能为烈士树起高大的纪念碑,只是主动地对墓地进行简单地修葺保护,却让我们看到了革命老区人民对烈士的爱戴之情,这种自发的感情是最为真挚的,当地老百姓知道,这是一位为追求民族独立解放而牺牲的同胞,作为后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他。

陈利生副主席将村里修葺烈士墓的有关资料发给我,我拿到后十分激动,马上向许绍志老师报告这一消息,许老师喜出望外,戴起老花镜,拿着图片资料仔细端详,喃喃自语:“好啊!人们没有忘记他们,也不能忘记他们,很好!”

2021年的清明节,在清凉峰镇林竹村老乡的向导下,我和陈利生副主席踏上了寻访无名烈士墓之路。

我们沿着当年寻淮洲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之路,从林竹村出发进入梓棚坞,暖阳下春风和畅,人迹罕至的山坞已经披上了绿装,满目苍翠,山花绽放。遥思1934年,寻淮洲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经过这条山坞时没有眼前的春和景明,那是一个冬天,清晨的山坞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霜,队伍激战后主动撤离侯头战场,向皖南方向转移,其中有一个伤兵,伤势较重,奄奄一息,由战友们用担架抬着撤离战场,鲜血滴在了沿路的青石阶上。到了梓棚坞深处的山核桃林中,战友们发现战友伤势过重,已经没有呼吸了。战友们立即向师长寻淮洲报告,寻淮洲神色冷峻地来到战士的遗体前,率领战士们脱下军帽,向牺牲的战友敬了最后一个军礼,其中一个抬担架的战士用布将烈士脸上的血迹擦去。由于担心反动派军队的追击,寻淮洲果断下令将烈士遗体草草地掩埋在了一棵山核桃树下,继续向木勺岭行军……

林竹村老人告诉我们,红军去后,有村民上山劳作,见树下有一堆新土,由于部队行军匆忙,遗体埋得较浅,风吹雨淋,烈士穿着草鞋的双脚已经露出来了,村民大吃一惊,回村里叫上其他村民,将烈士重新安葬。为避免当时反动政府的盘查,没有为烈士树碑,而是在烈士墓上堆放了一些石块,以便将来好确认。村民们清楚地记得,烈士遗体穿着血迹斑斑的灰布军装,头戴红星军帽,脚上是一双草鞋,年纪不过二十岁,面容瘦削却生得俊俏,没有任何其他信息。

山路崎岖,听着向导讲着87年前的红色故事,不知不觉已经在山路上前行了近一个小时,向导说,烈士墓就在前面那片山核桃林中,我们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来到了烈士墓前。这是一个小小的土堆,上面长满了青青的野草,开着黄色的山花,黑色的大理石墓碑长约一米,宽约50公分,上面写着“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无名烈士墓”,并标注了烈士牺牲的年月,1934年12月3日,落款是夏林村村民(林竹村更名前为夏林村)。我环视了一下墓的四周,青山环抱,山花烂漫,若是山核桃采摘季节,这里很是热闹,山路上往来着收获的山民,林竹村以及山那边的木勺岭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穷乡僻壤了,如今都已经脱贫致富,村民们过着幸福和美的生活,烈士有知,当能含笑九泉了。更值得我们欣慰的是,村民们没有忘记为民族独立复兴而牺

牲在革命路上的烈士,据村民们说,每逢清明时节,常常会有人前来凭吊追思。

后人不知道烈士从哪里来,只知道他为了革命牺牲并埋葬在这里,87年来,他的墓前没有亲人的鲜花和哭声,也没有高大雄伟的墓碑。当年或许是母亲送他参加了革命队伍,母亲也曾望眼欲穿,年复一年地红了春花,黄了秋叶,却至死未能见他归来。清凉峰的山水有幸,一杯黄土埋葬了烈士的忠骨;林竹村的百姓有情,斗转星

移铭记着烈士的孤坟。

安息吧,烈士!当初你为了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而参加了革命,并为之献出了生命。我们能告慰你的是,我们的祖国,不再山河破碎、满目疮痍;我们的人民,不再流离失所、衣衫褴褛。你参加革命的初心已经实现,革命的遗志一定会在清凉峰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永远传承。

(作者为金融工作者,现为上海银行临安支行行长助理)



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的文化自信探析

苏秋爽 雷家军

摘要: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高度的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撑,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的文化自信为提高中国人民文化自信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重要条件。他们的文化自信体现在坚信马列主义的文化真理性,向中国人民广泛宣传马列主义,唤醒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确信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相信人民群众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力量,为文化自信的建立确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相信综合创新的文化进步性,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汲取东西方文化之所长,运用到具体的革命实践中,促进文化与时俱进。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化自信

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是指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义或逝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均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运动领袖,或为党的创始人,或为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的文化自

信,不仅唤醒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而且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为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坚信马列主义的文化真理性

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5000多年绵延不绝、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精神滋养,也为人类文明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从16世纪起,随着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中国被卷进了世界资本主义浪潮,广大劳苦人民承受着国内封建势力与西方列强的压迫。无数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努力探寻着取得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的道路。太平天国运动虽严重打击中外反动势力,加速清政府的灭亡,但仍以失败告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希望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维护封建统治,但也在甲午一战中被摧毁;改革由器物学习到制度学习的戊戌维新运动,通过学习西方的制度优势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也在守旧派的强

烈抵制下化为泡影；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进行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也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革命果实被代表帝国主义的袁世凯所窃取，中华民国名存实亡，时代呼唤新的救国理论出现。这些救亡图存的革命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以及中国人民文化自信的缺失，时代呼唤新的文化自信的建立。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让探求救国真理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看到挽救国家危亡的希望。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①作为指导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俄国十月革命的检验后，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

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坚信马列主义的文化真理性，积极学习马列主义，试图用这一先进的理论去分析和思考中国革命问题。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之一，在法国求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赴法留学时，蔡和森引导

大批留法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将自己在法国的研究成果寄回国内，积极宣传马列主义。通过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工人阶级群体的思想觉悟，促使中国先进阶级的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逐步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建党前后，蔡和森还坚持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做斗争，坚决捍卫马列主义。1922年9月，蔡和森担任《向导》的主编，这是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的第一份公共机构报纸，为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供了平台。^②在革命实践中，蔡和森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代表，高君宇更是对马列主义的文化真理性坚信不移，他积极学习马列主义，并且通过各种渠道宣传这一先进理论，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高君宇创建学会、书社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培养马克思主义青年的过程中，将马列主义宣传扩散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同时，高君宇还参与编辑机关刊物增强马列主义的宣传，他与蔡和森一起创办以反帝但封建为宗旨的报刊——《向导》，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撰写和发表一系列时事政论文章，一些文章被读者誉为“唤醒世人的警钟”。^③1920年3月，

高君宇还与邓中夏等人,在北大创建马克思主义学说研讨会,加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高君宇不仅在思想上坚信马列主义,在行动上也促进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得中国更多的有识之士了解并熟悉马列主义,提高民众觉悟。

任何理论都必须与实际相结合,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坚信马列主义的文化真理性,开创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先河。正如《李大钊烈士碑文》中所写的,“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④(他高擎马列主义的旗帜,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他指出,“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⑤李大钊为当时扩大马列主义的影响,推动革命实践,增强社会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知做出巨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⑥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坚持马列主义的文化真理性,通过各种渠道积极传播马列主

义,向大众展示马列主义的精髓,对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为当时的青年引导正确的革命方向,为当时中国人民建立新的文化自信创造了重要条件。随着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们对马列主义的宣传与深入研究,更加确信马克思主义道路是中国的光明之路,带动了更多马列主义的宣传者转变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他们坚信并宣传马列主义,唤醒了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乃至中国全体人们的民族意识,唤醒工人阶级的斗争思想和阶级觉悟,将马列主义深入工人运动,为后来的更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做了铺垫。先驱领袖们坚信马列主义的文化真理性,在中国革命道路上将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与具体实际相结合,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建立新的文化自信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确信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

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确信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是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将马列主义群众观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结果。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本”思想,孔子、孟子、荀子都是先秦民本思想的代表人物。在《论语·颜渊》中就提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尽心》也曾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

王制》中也提到“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曾推动社会的前进和发展，但是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群众的重视是十分有限的，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也充分证明了封建统治者与平民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认识的不足。

十月革命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深刻了解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确立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看到了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巨大力量。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开创者，他在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言的报告中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们确信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夺取党的事业胜利巨大伟力。

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从中国的革命实际出发，批判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创造性的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进行发展与应用，始终确信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恽代英认为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可磨灭，人民主

体是他一贯坚持和倡导的价值观念。“革命是要靠群众的力量的。除了使群众都接受革命的宣传，没有法子扩大革命的力量而促其成功。”^③恽代英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理论家，较早的认识到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巨大力量，他在《组织群众与煽动群众》一文中谈到了群众的重要性，“我们首先要认清群众运动的重要，群众是我们革命的基础，革命运动的成败，完全要看群众运动的基础如何。”^④恽代英不仅在思想上认识到群众的创造力，在实际工作中更是坚持群众路线与群众观点，坚持将尊重社会规律与发挥人民尊重力量相统一，合理的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将人民群众有效的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群众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作为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之一的邓中夏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始终胸怀群众，坚持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在长辛店时期，邓中夏与工人同吃同住，深入工人生活；在上海工人大罢工期间，他走在斗争的前线，与工人一起举行罢工游行集会；在香港海员罢工期间，他更是与工人统一战线，始终保持与工人的亲密关系。他曾提出，“我们不欲革命则已，要革命非特别重视工人运动不可。”^⑤邓中夏团结工农群众，通过深入工农群众

生活,深刻了解工人中所蕴含的革命情绪和决心,始终坚信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他关心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明确指出革命想要成功,必须重视和依靠人民群众,邓中夏始终确信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牢牢把握群众立场,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内涵和要求,努力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瞿秋白同志在其革命生涯中,在思想与实际革命工作中都始终坚信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把群众观念作为指导工作的根本观点。他在党的六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的中心工作是争取群众。”^⑩瞿秋白认为,党的一切工作必须得到群众的支持,才能得以开展。他把提高群众的阶级意识放在首位,把尊重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他提出:“只有当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的口号下,把亿万农民群众发动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推翻帝国主义。”^⑪作为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从马列主义理论出发,坚持唯物史观,坚持群众路线,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

人民造福。”^⑫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们确信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对党以及党的事业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推进和谐党群关系的建立,巩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在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创造性,极大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也促使马克思主义学说更加丰富。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坚持以人民为主导,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巩固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牢固树立群众观念,促使党员干部信任人民群众,群众相信党员干部、党组织,为推进和谐的党群关系提供了桥梁;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确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为推动党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对中国共产党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确信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确信人民群众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为文化自信的建立找到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相信综合创新的文化进步性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中

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都以失败告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社会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但是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动摇牢固的封建根基,且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种种行为都试图将历史拉向倒退,违反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证明了无论是坚持继续走封建主义老路还是转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都行不通,十月革命的胜利,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迷茫的中国人指了一条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相结合,运用到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始终相信综合创新的文化进步性。

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之一,是我国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面对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称帝、张勋复辟的一系列事件,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举起反封建的旗帜,反对“孔教”。他反对的“孔教”与我们所讲的儒家思想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别,新文化运动前的“孔教”是一种愚昧的思想,陈独秀在《孔教研究》这篇文章中就鲜明地指出:“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⑩陈独秀发起以自由、平等为观念的新

文化运动,解放了人民群众思想,使西方资产阶级各种政治学说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为中国人民接受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提高文化自信创造了条件。

随着国门被迫打开,西方文明逐渐涌进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势均力敌的两种力量。部分知识分子的全盘西化论或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改造西方文化的主张,使得李大钊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提出全新的文化调和论。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研究后,找到自己一直寻找的“第三文明”,发展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即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中西优秀文化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文化。李大钊充分肯定西方文化先进性、优越性的同时,推崇儒家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人生观,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发展为革命的英雄主义,强调青年要“顺着向未来发展的大自然大实在的方面昂首迈进,变逆退的为顺进的,变静止的为行动的。”^⑪李大钊秉持与时俱进的文化心态,始终坚持文化应该面向世界,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他以开放的认识视野,以时代精神为前提,使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与西方现代文化的交融互生中,得到了阐扬和光大。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对中华民族产

生深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思想家、理论家恽代英,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救亡图存的革命道路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提出一些较为合理的社会文化改造的思想。恽代英认为,“不相信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便没有民族的自信力,便不能创造文化,那便中国人只好束手待毙,没有存在于世界的权利。”^⑩由于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恽代英对传统文化以及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由怀疑转为部分接受,最终转为钻研和汲取。大学毕业后,恽代英致力于将先进西方文化引向社会,以达到唤醒民众、改造社会的目的。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恽代英反复思考比较后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且承认中西文化皆有所长,希望汲取两种文明的长处,融合、造就新的文明,建立适应社会改造的文化思想。

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相信综合创新的文化进步性,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既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又有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鉴,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当代价值。中华文化是中国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最大核心竞争力,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石,是中国不断发展的动力之源。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相信综合创新的文化进步性,也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坚信,对中国人民提高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推

动作用。李大钊曾说西方文化“虽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而以临于吾侪,则实居优越之域。”^⑪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相信综合创新的文化进步性,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主动向西方学习,利用西方文化的长处,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永葆生机,也为如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提高人民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借鉴。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⑫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的文化自信为人民群众文化自信的建立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认识和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进程。2021,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年,中华民族已经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的时代,新的征程,我们应该时刻铭记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们杰出的思想理论,学习他们的文化自信,汲取他们的伟大的精神和坚定的理想信念,不忘革命初心,牢记时代使命,继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参考文献: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论人民民主专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471.

②蔡和森.《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

③高君宇.《高君宇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李大钊烈士碑文》.1983.

⑤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7.

⑥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2018-5.

⑦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论联合政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1031.

⑧恽代英.《恽代英文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742.

⑨恽代英.《恽代英文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906.

⑩邓中夏.《邓中夏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2.

⑪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579.

⑫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86.

⑬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0.

⑭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245.

⑮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53.

⑯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08.

⑰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08.

⑱习近平.《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

(作者:苏秋爽,浙江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雷家军,浙江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口述史是编修高质量地方志书的需要

金雄波

摘要:在已出版的第二轮地方志书中,口述史比较缺乏,尤其是反映人的思想性资料,则记述得更少,使编修的地方志书没有能充分利用且体现口述史的价值,直接影响新编地方志书质量。第二轮地方志书中没有重视收集口述资料并记述口述历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对地方志书的特性缺乏足够认识,因而按首轮编修地方志书的老办法、老习惯“闭门修志”。解决新编地方志书不重视利用口述史的问题,首先运用新观念、新思想,真正确立“民本位”的编纂思想。需要参与编修地方志书的人员,都能充分认识口述史是编修地方志书真正的第一手资料,是地方志书不可或缺的资料,更是编修高质量地方志书的需要,这是地方志书的性质所决定,也是发挥地方志书“存史、资政、育人”功能的需要、是反映一方人之精神的需要、突出地方志书特点的需要。

关键词:口述史编修;高质量;地方志书

口述史是在访谈口述史料基础

上,结合文献资料,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和提升。^①编修第二轮地方志书在“资料收集难度大”^②的情况下,收集口述史料并记述仍没有引起更多的修志者足够的重视。在已出版的第二轮地方志书中,缺少口述史,尤其是反映人的思想性资料,则记述得更少,使编修的地方志书没能充分利用且体现口述史的价值,直接影响新编地方志书质量。口述史是地方志书记述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真正的第一手资料,能更好地体现地方志书真实性的不可或缺的资料,更是编修高质量地方志书的需要。因此,为提高地方志书的质量,必须重视利用口述史,尽可能地全面收集口述资料及记述口述史,使编修的地方志书记述事物的内容完整,有深度,资料全面系统。

一、第二轮地方志书缺少口述资料记述的主要原因

第二轮地方志书没有重视收集口述资料并记述口述历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还是老观念、老思想,对地方志书的特性缺乏足够认识。编修地方志书应坚持“以人为本”的重要

性缺乏足够认识,因而仍按首轮编修地方志书的老办法、老习惯“闭门修志”。

(一)对地方志书的特性缺乏足够认识

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指出,地方志书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资料性文献”是地方志书的特性,“全面系统”是记述地方志书的要求。地方志书要做到资料全面系统,成为资料性文献,口述史是不可或缺的资料。在第二轮编修的地方志书中,由于对地方志书的特性缺乏足够认识,因此编修地方志书只强调收集有形资料,要求做到覆盖面广而全,而没有要求重视收集口述资料。

(二)编修地方志书应坚持“以人为本”的重要性缺乏足够认识

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中具有根本性的地位与作用,即人既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主体,又是发展的对象,不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的作用。所以,编修地方志书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注意记述‘人’,反映‘人’”,^④才能成为高质量的地方志书。在已出版的第二轮编修的地方志书中,由于对坚持“以人为本”原则的重要性缺乏足够认识,使编修人缺乏开阔的视野,记述的资料具有

一定的局限性,从而编修的地方志书很少看到人的活动、人的思想、人的品格和人的形象等反映人精神面貌的内容,以致出现“见事不见人、见物不见人、见人不见精神”的状况。有的地方志书“虽然加强了‘人’的记载,但对人民生活的反映仍然存在不足,对‘民生’问题,如医疗、住房等根本问题的记述不足、不深。”^④

(三)按首轮编修地方志书的老办法、老习惯“闭门修志”

编修第二轮地方志书按首轮编修地方志书的老办法、老习惯“闭门修志”,即编修的县志、镇志的资源来源主要依靠政府及部门提供资料,编修人员多对政府及部门档案资料和文献资料的收集和使用;忽视向广大群众、老领导和老同志、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熟悉本行业、本专业人士广泛搜集口述资料。地方志书记述口述史,不但能反映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进步程度,而且能反映当时人们的精神面貌,即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人格、理念和理想及对事、对物、对事件的看法、想法等等。记述来自亲历人(当事人)的口述史料,更能反映事物、事件的真实情况,又能弥补有形资料的不足。而在第二轮编修的地方志书中,对口述史的必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忽视了口述史料的收集与记述。

二、利用口述史是编修高质量地

方志书的需要

解决新编地方志书不重视利用口述史的问题,首先运用新观念、新思想,应力求摆脱传统地方志书的“官本位”旧思想,而真正确立“民本位”的编纂思想。需要参与编修地方志书的人员,都能充分认识口述史是编修地方志书真正的第一手资料,是地方志书不可或缺的资料,更是编修高质量地方志书的需要,这是地方志书的性质所决定,也是发挥地方志书“存史、资政、育人”功能的需要、是反映一方人之精神的需要和突出地方志书特点的需要。

(一)利用口述史是地方志书的性质所决定

《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指出:地方志书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所以,地方志书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地域性、资料性(思想性)的特征。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是资料性。全面性、系统性和区域性特征都是因资料性而存在,都要受资料性的制约和影响,都要通过资料才能得以体现。如地方志书缺少了口述史,就有悖于地方志书的最基本性质。

(二)利用口述史是发挥地方志书“存史、资政、育人”功能的需要

地方志书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将口授史料和口传资料记入地

方志书予以保存,为今人和后人所了解和认识,这为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进步发挥一定的作用;将人的思想性资料录入地方志书,这对当地政府及部门研究一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准确、可靠的资料,以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将反映人的精神面貌的资料载入地方志书,对现代人、后代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激励人们为振兴经济、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是十分可贵的资料。

(三)利用口述史是反映一方人之精神的需要

地方志书被称为“一方之全书”,而贯穿于“一方之全书”之中的是一方人之精神。根据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印发全国第二轮市县志编纂经验交流性会议纪要的通知》(中指办字[2006]36号)精神,地方志书记述的内容,应该重视非物质文化内容的记载,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加强精神文明、思想道德等内容的记载,注意记述“人”,反映“人”,从中反映一方之精神。

(四)利用口述史是突出地方志书特点的需要

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点是地方志书的编修原则。第二轮地方志书的上下限时段内,改革开放不断发展,企业体制等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私有经济不断壮大,尤其

是全民、集体企业职工就业从企业改革前的“铁饭碗”，到改革后的市场化，等等。这些情况和人们对改革及改革后的变化的看法、想法和理解、认同程度等所反映出来的言和行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各地反映出来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所以，记述以上这些口述史料，能使编修的地方志书体现时代特色、地方特点。

三、《萧山市志》利用口述史的实践

为了解决第二轮编修地方志书“资料收集难度大”的问题，使编修的地方志书记述事物（事件）的内容完整、有深度、资料全面系统，第二轮编修的《萧山市志》实行“开门修志”，即采用“访谈式”“讲述式”等多种方式收集口述史料并对资料进行加工、整理和提升，利用设置《口述历史》第六册、设置访谈录和回忆录^⑤以“附”的体裁等多种形式入志，使《萧山市志》成为高质量的地方志书。《萧山市志》出版后，在方志界引起强烈反响，被修志专家、知名学者高度赞赏“是二轮修志的典范之作”^⑥、“新方志的扛鼎力作。”^⑦目前，《萧山市志》已经交流到全国近30个省、市、自治区，并被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等海外著名藏书机构收藏。此外，还被收录在全球在线计算机图书馆中心的世界总书目。

《口述历史》专册，访谈了91位不

同典型人物与口述人工作相关的历史事件、人物记忆、事业发展、成就印记、特定专题和人生经历等；访谈录，采访4家私营工业企业创始人董事长（总经理）谈企业的建立与发展；回忆录，由4家乡镇集体工业企业经营者叙述所经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萧山市志》口述史的利用，拓展了地方志书记述史料搜集的范围，改变了地方志书的传统编修方式，呈现“开门修志”特性，标志着口述史视野下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新趋向。《萧山市志》的实践证明：口述史对弥补资料的缺失，复活历史事件的细节，挖掘和抢救“活史料”；反映历史的真实场景、历史事实；体现“坚持‘以人为本’”的修志理念，加强对“人”的记述，反映人民的生活、生产和精神面貌；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等，起到了档案资料、文献资料都无法替代的作用。口述史还对档案资料和文献资料的补充、鉴别和印证发挥了重要作用。口述史入志还具有生动形象，内容详实的特点。

（一）《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作为《萧山市志》第六册，是《萧山市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口述历史》采访了91位不同典型人物，其中萧山籍口述人（包括萧山籍在外著名人物、萧山名人家属〈后代〉）采访稿有61篇，占67.03%；非萧山籍口述人采访稿有30篇，占32.97%，其中解放初山东籍南下干部采访稿有9篇，

占9.89%采访前,根据各种人物的不同情况,分别制定采访提纲并提前告知受访者,同时联系好采访地点,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进行,内容涉及与口述人工作相关的历史事件、人物记忆、事业发展、成就印记、特定专题和人生经历等。^⑧

1. 发生在萧山的具有历史价值事件的回忆。如李岳校讲述的“李成虎领导的衙前农民运动”“李成虎墓的今昔”“捣毁米店和西小江事件”;曹寿恩讲述日本鬼子、国民党、土匪所犯下的罪行;刘邦俊讲述南下萧山、深入虎穴“招降土匪蒋咏泉部的经过”;马保山讲述“剿匪反霸”;钟儒讲述“解放初期的匪情”“地方与部队合作剿匪”“俞继鹏匪部被剿灭”“萧山的土地改革”;楼祥永讲述“艰难的剿匪反霸工作”“土地改革与镇压反革命”;潘振铎讲述的1955年“萧山铁路通天案”和1956年“击落敌机、消灭敌特”事件;安敏讲述发生在1958年“大跃进”时候“反革命复辟案件”的真相;牛树桢讲述“见证毛主席到萧山的经过”;赵根盛讲述国家重要领导人在萧视察期间的警卫工作;韩毓南讲述开办衙前农村小学校;黄永石侦破九宫后天道^⑨的经过;朱柏川讲述萧山县设市的背景、过程;施加农讲述跨湖桥文化遗址的发现、发掘、保护、命名过程。

2. 萧山社会事业发展的记忆。陈鹤讲述的1949年的6月接管湘湖农场

后的发展历史;吴关泉讲述“吴关泉互助组创办的历程”“从互助组发展到合作社”;邱忠宇讲述“从公私合营杭发厂到通用电气杭州公司的变化”;朱鸿讲述“通用电气杭州公司的企业状况”;张香莲、邱道明、高文照、石志芳讲述杭州第二棉纺织厂的创建、发展与改制;单元政讲述“萧山化肥厂的创办”“萧山二轻的改革与发展”;叶国珍讲述“萧山恢复南宋官窑”;徐华山讲述“从农业学大寨到发展乡镇企业”“经济发展了,农村大变样”;杜文辉讲述“萧山乡镇企业的起步和发展”的历史;赵锡祥讲述“萧山花边”发展历史;莫观馨讲述了围垦指挥部成立、六期围垦,其中“最大的一期围垦——五万二”,在围垦“抗击13号台风”;费根楠讲述萧山“围垦”的壮举。丁友根讲述的“红山农场的发展历史”;陆炎明讲述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立与发展;沈银昌“沈银昌讲述的萧山商业城筹建、开业与发展”;孔吾德讲述“萧山广电事业的创立与发展”;孙庆华讲述在河上“治血吸虫病”;李立兴讲述“建立民间消防队”“救援汶川地震”;施加农讲述从建立萧山文博机构至后来的发展历程,跨湖桥文化遗址的发现、发掘、保护、命名及其历史地位。

3. 专题性的访谈。例如裘迅翔、葛永兴讲述“民族英雄葛云飞”“葛云飞后代”;瞿独伊讲述“印象中的父亲瞿秋白和母亲杨之华”“妈妈杨之华

‘一生坎坷一片丹心’；刘宪康讲述“萧山方言的历史”“萧山方言的地方特点”“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生存权”；王伟常讲述“萧山姓氏和家谱”。

4. 个人人生经历的印记。如张桂凤讲述“童年戏剧生涯的记忆”“奉献戏剧事业”；张凤翔讲述“潜伏当‘督导员’”“接管伪政权”；周群讲述“从参加浙东游击队到在萧山办报”“创办全国第一张县报——《萧山报》”；张义讲述“18岁参军，成了抗日战士”“解放战争中九死一生”“参加抗美援朝”“发展萧山卫生事业”“投身环保事业”；丁守安讲述“随军南下到萧山”“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文化大革命’后负责办麻纺厂、化肥厂、树脂厂”；吴克明讲述“参军立志为航空事业作贡献”“第一件事——抗美援朝打下两架敌机”“第二件事——当上了试飞员”^⑩；蔡大生讲述的“儿时在萧山的经历”“艺术道路——从国内到国外一路奋斗攀高峰”；蔡福源讲述的“演义”之路；陈红讲述的“青少年时期的经历”“被划成‘右派分子’的经历”；陈来法讲述“从萧山逃难逃荒到弋阳”“萧山移民在弋阳创业发展”“开展弋阳与萧山的经济合作”的经历；费成益讲述“从养鱼到养龟”的工作经历；陈拯民讲述的“竹林寺妇科历史悠久”“两代传人的身世遭遇”；董达荣讲述“我走过的艺术道路和成就”；董光中讲述“前30年搞摄影工作的经历”“后30年

镜头下的变化发展”“退休后没放下相机”；杜觉民讲述“童年少年的记忆”“走上美术之路”在中央美术学院”；冯耀忠讲述“我的微雕之路”；傅展讲述的“求学经历”“学生运动”“参加中共地下组织”“被判死刑到无罪判决”；韩济生讲述“学医从医的经历与成就”；金鸣珠讲述“‘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的迫害”；金其法讲述“‘文化大革命’的两次被‘打倒’，两次‘解放’”；莫小米（杭州知识青年）讲述1968年12月至1971年在萧山乐园公社红卫大队插队落户的经历；任宝凯讲述“在波兰、南斯拉夫当大使馆武官”；魏天钦讲述“年轻时去香港谋生”“在香港吃苦耐劳、诚信为人发家”“在家乡创办传关医院”；汪忠镐讲述“在北京协和医院取得的成就”。

5. 对萧山未来发展的建言。口述人讲述了记忆中的故乡印象：如来新夏讲述“故乡回忆”；牛畏予谈“萧山印象”；瞿独伊“对故乡的印象”；瞿祖赓讲述“现在的萧山让我感到自豪”；任宝凯讲述“作为萧山人，我从自卑到自豪”；汪忠镐“惦着家乡的事”；吴克明讲述“孩提时记忆中的萧山”；于引讲述“数次回家乡杂忆”“童年记忆中的家乡”；张桂凤讲述“我对萧山的印象”；周汉荣讲述“家乡度过的幸运时光”“为今天的萧山感到自豪”。口述人还对萧山未来发展建言，体现了这部口述历史与别的口述史不同之处。

口述人希望萧山的文化和经济同步发展、发扬勇立潮头精神、重视环境保护、尽快恢复生态、保护萧山传统文化、提高人民文明素养、政府应该多支持实体企业发展、重点向科学进军、注重创造创新、全面地融入大杭州等方面提出恳切的建言。言语中,无不包含对萧山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关切!

(二)访谈录

第二轮编修《萧山市志》的上下时间内,由于机构变更、部门撤并,增加了资料收集的难度,连续性的经济指标难寻找,遗失的资料难追回;尤其是无主管部门的私有企业,按照职能分工,相关资料都分散于各经济管理部门,难以收集全面系统的资料,而且承编单位难落实,资料收集难成为第二轮修志的最大问题之一。为全面系统记述私有工业发展历史与现状,解决资料缺少的问题,对浙江国泰密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子仁等4位私营工业企业经营者进行访谈。

访谈前,将设计的15个访谈问题用传真的方式送达被访人员,并约定时间到被访人员所在企业访谈。访谈采访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进行。访谈资料以“附^①”的体裁入志。通过向私营工业企业经营者进行访谈,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萧山私营工业企业的总体发展情况、私营企业从家长式管理到家族式管理再到现代企

业制度的整个发展演变过程,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萧山私营工业企业业主的创业动机、如何创业、创业资金、生产资金、生产经营、发展原因、最大挫折、主要困难、从业人员(包括工资、福利、社会保险)等重要历史资料。将其资料整理成《萧山私营工业企业经营者访谈录》,并以“附”的体裁入志。

(三)回忆录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有的乡镇企业经营者在市场竞争中,尤其在面临国家宏观调控、银根紧缩、产品市场销售疲软中,能高瞻远瞩,机智果断,凭借自己的睿智和魄力,及时采取措施,调整发展战略,改革管理制度,广纳人才,提高职工积极性,立足国内市场,面向国际市场,使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持续发展壮大;有的则无可适从,举步维艰,缺乏应变能力,使企业由兴旺到衰落,最后歇业、转让。选择鲁冠球等四位乡镇集体工业企业经营者叙述所经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四家乡镇集体工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是萧山工业企业兴衰的一个缩影,为萧山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根据对四家乡镇集体工业企业的初步了解,采访前设计好采访提纲并提前告知受访者,供受访人叙述或书写,由编写人员记录或修改,不注明“问”

“答”，以“附”的体裁入志。

参考文献：

① 宫丽云：《关于口述历史》，“网络／文献／兰台漫步 2016年7月21日”。

② 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国第第二轮市县志编纂经验交流会会议纪要的通知》（中指办〔2006〕36号），2006年12月19号。

③ 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国第第二轮市县志编纂经验交流会会议纪要的通知》（中指办〔2006〕36号），2006年12月19号。

④ 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国第第二轮市县志编纂经验交流会会议纪要的通知》（中指办〔2006〕36号），2006年12月19号。

⑤ 宫丽云：《关于口述历史》，口述历史必须具备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亲历者（或者当事人）。”“第二个要素—历史。”“第三个要素—叙述。”“口述史料……可以呈现的形式为：口传史料、回忆录、访谈录等。”网络／文献／兰台漫步 2016年7月21日。

⑥ 张英聘：代表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在《萧山市志》首发式上的发言。（张英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⑦ 巴兆祥：《新方志的扛鼎力作：〈萧山市志〉读后》，《浙江方志》2016·1，

第22～26页。（巴兆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

⑧ 本册尊重访谈人的叙述模式，真实保留口述内容，最大限度地保留口述原貌。口述人口述的历史，通过求证网络、档案资料、历史文献等尽量还原史实。口述人讲述的人名、地名等，转录时尽量通过文献记载或调研，予以校核，确实不能查核有存疑者，用相同发音字记录，并作括注。

⑨ 九宫后天道：清朝兴起的一个会道门团体。光绪年间，直隶八卦教徒李向善徒步走到山西五台山南山寺，落发为僧，法号普济。他神通广大，交结四方，广揽门徒，在不长时间里把遍布华北及东三省的教徒罗致门下，在北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无边的教派，号曰九宫道。

⑩ 中国喷气式飞机第一个试飞员。1956年生产的一架歼-5新飞机，这是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

⑪ 《萧山市志》编辑部将“录”分解为“附录”和“附”两种体裁，“附录”是录入志书的原始文献、补遗考订等具有重要存史价值的资料；“附”是由修志者撰写的具有重要存史价值的入志资料。

（作者为《萧山市志》副主编）

吴越国首开北方茶叶之路

顾彭荣 袁少华

摘要:唐末五代十国之一的吴越国对内鼓励农耕,“摘山煮海”,对外“善事中国”,以茶进贡,特别是与北部大草原的契丹进行茶马交易,茶叶在双方外交关系中起直接作用。频繁的商业往来促成了洲际的交流系统,吴越国首开北方贸易茶叶之路。11世纪早期,吴越国与契丹君主之间签订茶叶贸易协议,为后来的茶叶之路通往俄罗斯转而欧洲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吴越国 契丹 茶马交易 北方茶叶贸易之路

唐末五代十国之一的吴越国,开创者钱镠(852—932),杭州临安人,建都杭州,占地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其范围包括今之浙江省十一个市的全部,以及江苏省的扬州、苏州与福建省的福州。历三代五王,至公元978年纳土归宋,在位近百年。其基本国策:经济上鼓励农耕,兴修水利,捍筑海塘,治理湖浦,奠定了浙江粮仓杭嘉湖平原的坚实基础,江南一带农商经济由此有较大发展。“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苏轼《表忠观

记》)。政治上采取“善事中国”的保境安民政策,维护两浙安宁,“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苏轼《表忠观记》)。钱镠与其后继者共“三世五王,与五代相终始”(苏轼《表忠观记》)。悠悠千古,独此一家!故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钱镠善事中原的国策给予高度评价:“钱镠所立家训,乃至临终遗嘱,念念不忘要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大事之礼。”自北宋至清,历代王朝一致肯定钱镠的历史贡献。北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欧阳修《有美堂记》中的评价很有代表性:“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

吴越国对于茶叶之路的开辟至关重要。最突出的是,它和北部大草原的契丹蒙古人的商业往来,促成了洲际的交流系统,是吴越国首先开辟亚欧茶叶之路。

以茶贡奉 善事中原

茶,为“南方之嘉木”。吴越地区一向产茶,唐时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就说,浙西之茶“以湖州上,常州次”。至五代时,吴越产茶区迅速扩大,湖州、杭州、睦州、苏州、越州、明州、婺州、台州等八州均有相当产量。名茶有长兴县顾渚山的紫笋茶,天目山与杭州天竺、灵隐的绿茶,睦州鸠坑的团茶,越州余姚县瀑布岭出产的仙茗茶,婺州的东白茶等。唐时,苏州的茶叶无论是产量还是品质都比不上湖州与常州;而在五代吴越时期,苏州茶的品质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太湖洞庭山的茶叶也成了贡品。

杭州是吴越国都,盛产好茶。淳安、临安等地在五代时所产的大方茶已为名茶,成为进奉中原王朝的贡品。《旧五代史·梁史》卷六:乾化元年(911)十二月,“两浙进大方茶二万斤”。可见大方茶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形成规模生产,而且产量相当可观。此外,《吴越史事编年》《十国春秋》记录吴越国对北方中原王朝的贡茶情况,证实当时吴越国的茶事状况:吴越宝正三年(928)八月,吴越王钱鏐派袁韬向后唐进贡白银5000两、茶2.7万斤。吴越宝正四年(929)八月,钱鏐进茶2.7万斤。吴越天福二年(937),钱元瓘进贡后晋茶器,又进茶5万斤。吴越天福三年(938)十月,钱元瓘进谢后晋,贡品包括大茶、脑源茶2.4万斤。吴越天福七年(942)进贡茶2.5万斤。

吴越开运三年(946)十月,钱弘佐向后晋进贡脑源茶3.4万斤。吴越乾祐三年(950)十一月,钱弘俶向后晋进贡茶3.5万斤。开宝九年(976),钱弘俶进贺银织、乳香、吴绫、绉绵、钱茶、犀象、香药皆亿万计。这样不间断地进贡,在整个吴越国时期未曾中断,而每次动辄数万斤的贡茶运往北方,可测算当时吴越国茶叶生产量的庞大。

《册府元龟》卷四八四《经费》载:五代十国(907~960)时,南北茶叶贸易持续不断。吴越王钱鏐多次向华北政权进贡茶叶,并“差使押茶货往青州(今山东境内),回变供军布衫段送纳”。这是吴越官方以茶叶换取军需布衫的变相贸易。

五代吴越积极发展茶叶生产,特别是在低丘缓坡地大量种植,茶叶产量逐年提高,茶叶的制作也日渐考究,除了大量生产用于与北方贸易的茶叶外,还研制了精制的“脑源茶”,主要用于向中原朝廷贡奉。“贡茶”的生产,反过来大大促进了茶叶研制,许多“名茶”应运而生。据不完全统计,五代吴越仅先后向中原朝廷贡奉的茶叶计达60余万斤,而用于与北方贸易的茶叶,其数量自然要多得多。

发展茶业 促进贸易

茶叶作为贡品大量输往北方,也刺激了吴越国内的茶叶生产。《隋唐五代史纲》说,“吴越境内,厥植唯茶”。又据《十国春秋》载吴越国因兴修水

利,开发荒亩,而致农业岁岁丰收,从而形成“鱼米之乡”。粮食丰足后,遂把原种粮食的低丘缓坡改种茶、桑、棉、麻,从而形成“丝绸之府”和“山海之利”。吴越国并把数量甚巨的大米、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通过水路,出口到日本、新罗(古朝鲜)、契丹(即辽国)、波斯(即伊朗)、大食(即阿拉伯)等国,从而又促进了对外贸易。

这一阶段的建州茶,提升了吴越国的茶叶生产水平。唐末,王潮、王审知建立闽国。由于采取了保境安民的立国方针,使福建建安地区的茶叶生产大规模得以发展,为以后宋代北苑茶的生产打下基础。北苑本是南唐的一处宫苑。公元944年,吴越国攻克福州,北苑茶园自然也就归于吴越。入宋以后,建安凤凰山一带也被称之为“北苑”,其中品质最好的茶产在壑源一带,叫作“壑源茶”。据杭州“中国茶叶博物馆”资料:宋初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北苑已造龙凤团茶。咸平间(998~1003)丁谓造“大龙团”以进。庆历时(1041~1048),蔡襄造“小龙团”,较“大龙团”更胜一筹。北苑贡茶,品色繁多,贡品极盛之时,凡四千余色。

在唐代,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主要是绢马贸易,而在五代时期则逐渐向茶马贸易过渡。至宋代,茶马贸易遂发展成为内地与周边民族贸易的最主要形式。

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五

代十国时期茶产量与产地均比唐代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饮茶风习的普及促使茶叶消费量有了较大的增长。茶叶产量与产地的大幅增长,满足了北方因为饮茶风习普及而需求的大量茶货,促进了南北茶叶贸易的增长。又因为南北政治对峙,北方所需茶货常常只能通过贸易一途获得,从而使得茶叶成了南方向北方输出的大宗商品之一。朝贡贸易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贸易形式,如吴越国每次动辄贡茶数万斤。南北茶叶贸易,官、私长途贩运也是一种主要形式。

在北宋时期(960~1127),中国的国家垄断政策被称作“摘山煮海”。“摘山”指的是收获茶叶,“煮海”指的是从盐井和盐池蒸发水分而得到盐。茶叶和盐成为富有的北宋朝廷的重要财政来源。仅在1060年,福建西北地区就收获了5.2万担茶叶。其实,五代吴越国三世五王均早已“摘山煮海”,发展茶桑,以茶进贡,直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纳土归宋。吴越之地“摘山煮海”,为吴越国带来巨大财富,也成为宋初财政主要来源之一。临安是钱镠故乡,蒸蒸日上的茶叶贸易,给宋代的临安天目山茶区带来勃勃生机。其时茶区扩大,山区普遍植茶,天目山茶遂日渐闻名。北宋《太平寰宇记》载:“天目山多名茶,较他山采独迟。叶不甚细,以云雾高寒。俟其气足者为上,不多产。僧民资其粮以卒岁,其味厚。”天目山云雾茶乃以此为名。北宋《太

平寰宇记》卷九十三载：天目山，“《（吴兴）輿地志》云，上有两湖，若左右目，名天目也。山极高峻，上多美石、泉水、名茶。按，茶谱（陆羽《茶经》）曰：杭州，临安、於潜二县生天目山者，与舒州同。”据史料记载，就临安而言，唐与五代浙江名茶计10品，其中有临安天目山茶、昌化大方茶2品。宋代计40品，其中有临安黄岭山茶、於潜黄岭佳茗2品。

宋代是临安茶叶发展较快、茶文化繁荣活跃的时期。吴越国“纳土归宋”，但仍对盐和茶叶等关键商品垄断经营。

结交契丹 开启茶路

吴越国对于茶叶之路的开辟作出历史性的重要贡献。除始终如一以茶贡奉中原朝廷外，最突出的是，它和北部大草原的契丹蒙古人的商业往来促成了洲际的交流系统。

契丹是中古出现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北方草原强族，从公元4世纪始兴至13世纪初西辽灭亡为止，共存在近千年。自北魏起，契丹族就开始在辽河上游一带活动，至唐末建立了强大的地方政权。唐灭亡的907年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统治中国北方达二百余年，1125年为金所灭后，其余部建立西辽王国，又延续了93年。终辽一世，统治中心始终在赤峰地区。辽国疆域是宋王朝的两倍：东临北海、东海、黄海、渤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

山）、流沙（今新疆白龙堆沙漠），北至克鲁伦河、鄂尔昆河、色楞格河流域，东北迄外兴安岭南麓，南接山西北部、河北白沟河及今甘肃北界。由于契丹名声远扬，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辽先与北宋交战，“澶渊之盟”（澶渊是黄河下游的一个地名）后，双方长期维持了100多年的和平。辽末，女真族起事，辽帝国迅速走向灭亡，1125年为金所灭。

吴越国是南方最早与契丹朝廷接触的国家。由于中原地区先后有五代政权占据，所以吴越国与契丹之间的交往也是受五代政权与契丹之间政治关系的制约。整个五代，中原王朝与契丹之间一直和战不断，而以朱梁统治时期双方的关系最为融洽。吴越以尊奉中原王朝为国策，在与契丹的关系上自然也是唯马首是瞻，后唐时双方互相敌对，吴越国与契丹的关系便跟着疏远。总观十国，只有吴越一国由于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臣属关系，中原王朝允许其过境与北方的契丹进行贸易，所以相对于其他各国获得的畜产品要容易得多。

《辽史》记载契丹与吴越的交往频繁，两国除礼节性拜访、互通情报外，主要还是经贸往来。两国的使团，实际上就是贸易代表团。两国政府之间称“贡赐贸易”，民间则为“易货贸易”，早期双方主要是交易绢马，后逐渐转向交易茶马。贸易额规模很大，估计每年马匹当在万匹以上；茶叶，以中档

茶计,就达数万斤。两国贸易也可以通过海路,所以吴越国被契丹列为“航海输贡”国。由于双方交往吴越所输贡品均为北方稀缺物品,契丹的回赐丰厚,吴越在经济上也很划算。

据〔美〕艾梅霞《茶叶之路》述:后梁乾化五年(915),吴越开国君王钱鏐派遣商人使者进入北部大草原契丹,开创两国之间第一次商业接触,促成货物商业往来。后梁乾化五年(915)至后晋天福八年(943)间,吴越与契丹之间共有17次互访,而茶叶在双方外交关系中起直接作用。11世纪早期,吴越与契丹君主之间签订茶叶贸易协议,契丹首先把茶叶介绍给俄罗斯人,为后来的茶叶之路通往俄罗斯转而欧洲奠定了基础。吴越地区几乎垄断了茶叶商品交易,临安天目山茶区是当时发展茶叶生产与贸易的货源地之一。

南北的茶叶之路足迹,丈量下两个民族的经济生活。吴越国和北方的契丹民族,构成了一千年前的国际茶叶贸易的两端,是吴越国首先开创了北方这条茶叶之路。

公元1004年,北宋与契丹签订了“澶渊之盟”,北宋以茶为贡币支付给契丹。

根据“澶渊之盟”,北宋同意开放北部边界的五个永久贸易点。契丹王国则相应地开放自己的三个贸易市场。茶叶、丝绸、瓷器和谷物属于官方垄断商品,茶叶则必须从有政府执照

的吴越商人那里购买。由于拥有有利可图的执照,再加上地理和运输优势,吴越国商人与契丹国统治者一直畅通着后来不断加强的南北贸易渠道,政府官员也可以从中得到一定的红利。

公元978年,吴越王国第五个统治者钱弘俶“纳土归宋”,吴越王国被融入更为广义的、重新统一了的中国,可是,吴越地区通过发放(或买卖)执照,一直保持对盐和茶叶这样的关键商品的垄断经营。这样一个良好的运作体系,直至今之千余年间,吴越地区一直在中国保持着一个主要的茶叶贸易中心的地位。

北方茶路 功利千秋

吴越国与契丹商品贸易的主要特点:首先,南北方的贸易从唐代的以粮食、绢布为大宗贸易商品而转变为以茶马为大宗贸易商品,即北方主要向南方输出羊马等畜产品,而南方主要向北方输出茶叶。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五代十国时期茶产地与茶产量与均比唐代有了较大幅度的拓展与提高,饮茶风习的普及,促使茶叶消费量有了较大的增长。

此一历史时期的茶叶经济情况,杜文玉、周加胜《五代十国时期商业贸易的特点及其局限性》一文将其脉络梳理得非常清晰:以茶产地为例,唐代产茶州为43个,而五代十国时期已经增加到61个州府。北宋统一全国后茶叶总数为6085万斤,大体相当于宋初

全国的茶叶总产量。由于此时北宋建国不久,故这些数据实际上反映的是五代十国时期茶叶生产发展的情况。再根据《宋史·食货志下五》记载的宋初各地茶叶官价,可以推算出宋初每年茶叶总价约为1600余万贯,比唐代增加了一倍。当然这种推算只能得出一个大略的参考数据,并不十分精确。

早在唐代,一些民族就已流行饮茶,只是多限于社会上层,故所需茶货数额有限。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饮茶风习逐渐由上层向社会下层普及,遂使其所需茶货数额有了较大的增长。

其次,对外贸易商品的变化。在五代十国时期,海外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是香料、珍宝、药材、象牙等质轻而价重的商品,这一点与唐代相比并无大的变化,所不同的只是由于海上交通的发展,输入量有了较大的增长。最大的变化在于中国对外输出的商品种类,除了传统的丝绸外,茶叶、陶瓷以及铜铁制品等都成了对外输出的大宗商品。如湖州所产的团饼茶,“自潇湘而达于五岭,虽远自交趾(今越南北部及广西南部的一部分土地)之人,亦常食之”。说明中国茶叶已输出到东南亚一带。通过温州、泉州、杭州等港输出到新罗(今朝鲜)、日本的茶叶也为数不少。

吴越国首开北方茶叶之路的意义重大。虽然唐时中国茶叶已传至日本、新罗(今朝鲜),但仅是作为礼品赠送,或将茶籽输入上述两国,还不能算

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贸易。而吴越国是中国南部第一个和契丹建立正式贸易关系的独立国家,茶叶对双方的外交关系起着直接作用。正是由于吴越和契丹之间频繁而又规模巨大的茶叶贸易,双方都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从而推动了经济社会的进步,也为后来的中国茶叶往北走向蒙古和俄罗斯的亚欧茶叶之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十世纪时,俄罗斯尚处于基辅罗斯(862~1240)时期。这个时期,操蒙古语的契丹人首先把茶叶介绍给俄罗斯人,契丹人是突厥—蒙古草原上的茶叶贸易的关键人物。吴越国和北方的契丹,构成了一千年前的国际茶叶贸易的两端。至十七世纪,中俄之间展开了频繁的茶叶贸易,史称“草原茶叶之路”,始于福建武夷山,止于俄罗斯圣彼得堡,途径线路为:武夷山、铅山、九江、崇阳、咸宁、汉口、樊城、社旗、洛阳、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杀虎口、呼和浩特,经蒙古至俄罗斯的恰克图,往西至伊尔库茨克、乌拉尔、秋明、莫斯科、圣彼得堡。正是吴越国和北方的契丹,为今之中国往北、往西的“一带一路”首开先声。

契丹人不仅对吴越贸易有兴趣,而且想从吴越那里得到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商品。吴越国则对和契丹王国及朝鲜贸易都有兴趣。于是两国间的贸易协定把南北的经济体系联结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

吴越国与契丹之间的茶叶商贸发

展,直接沟通了契丹文明与吴越文明的相互影响,吴越的先进文化促进了北部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当13世纪马可·波罗到达杭州的时候,他宣称:杭州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为精致和高贵的城市,而这些都应归于茶叶贸易等给杭州带来的繁荣。

千余年前,茶叶已成为中国一大经济产业。“摘山煮海”,给中国,尤其是给中国东部沿海的吴越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正是发端于临安的吴越国,为中国茶叶首开北方茶叶之路进而开拓了亚欧国际贸易之路;正是发端于临安的吴越国,为“茶为国饮、杭为茶都”的成型积蓄了厚实的物质基础,并推送着宋代登上中华茶文化的高峰;也正是发端于临安的吴越国,孕育了一批世界上最有开创意识的商业群落,为当时乃至以后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注入了长盛不衰的活力,功利千秋,福泽绵长。

主要参考文献:

1、〔美国〕艾梅霞:《茶叶之路》,五洲传播出版社策划,中兴出版社出版,2007年2月。

2、屠树勋:《钱缪传》,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

3、杜文玉、周加胜:《五代十国时期商业贸易的特点及其局限性》,《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1卷第3辑,2006年7月。

4、王旭烽:《“摘山煮海”——吴越国时期的茶之旅途》,《天目茶谭》第四期,2012年10月。

5、中国网(中国报道):《摘山煮海——中国茶叶贸易的起源》,2009年5月21日。

(作者:顾彭荣,《临安市茶文化志》执行主编;袁少华,浙江省杭州临安东方茶业应用技术研究所所长)



普通一兵

范常文

采访对象：范常文，1929年出生，山东海阳人，1945年1月参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班长、副排长、排长、连长等职，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1951年任浙江军区某部管理员，1956年后任嘉兴专区疗养院总务处主任、临安县城镇联合诊所负责人，1959年后任临安县青云桥卫生所负责人、县卫生防疫站办事员。

我于1929年7月出生在山东牙前县（今属海阳县）。我家属于贫农，租种地主的土地，一大半收成要交给地主。生活贫困，经常吃不饱饭。

我8岁时在村里上学，一个星期上两天课，只断断续续上了一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已经9岁了。记得有一次日本鬼子进村抢粮食，还在村里放火，残杀没来得及逃走的村民。13岁那年，我参加了村里的儿童团。我经常和伙伴们在村口放哨，公路上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发现敌人来了，或者有什么异样的情况，我们就立即回村报告。那时，毛主席率领红军长征的故事已经在村里流

传，我知道了红军渡大渡河、夺泸定桥的事。共产党来了，村里也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许世友曾经住在我们村的范家祠堂，要我们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

由于父亲身体不好，我负起了养家的责任。16岁时，我给本村我二叔家做长工，工钱是一年150斤粮食。我前后做了一年长工，白天干活，晚上跟铁匠师傅学习打铁，给骡、马制作铁蹄，也打家用铁器。

1945年1月，牙前县独立大队的领导到我家乡招兵。这位队长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干部，只有一只手。家里生活困难，做长工太苦了，我就在村里报名参军了。

参军前，我一年到头穿的都是破旧的土布衣服，常常赤脚劳动。妈妈给我纳过一双布鞋，我高兴坏了。参军时，部队发给我一套新的黄色军衣、一双烤猪皮做底的鞋子，还有一支配了刺刀的长枪和三颗手榴弹。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穿新衣服。部队一年发两套衣服，一套单衣，一套棉衣。部队也发了个小本子，教我们学文化。

我在部队的大家庭里成为一名革

命军人。早晨起床后先出操,然后早餐,主要吃玉米饼子等。白天从事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我学会了一首歌:“天上有颗北斗星,地上有个毛泽东。他是我们的一盏灯,照着我们把路行。”那时部队子弹很少,战士们都要学会拼刺刀,我常常天没亮就起床练习拼刺刀。部队非常注意遵守群众纪律,爱护老百姓,行军路上不能踩坏老百姓的禾苗。如果住在老百姓家里,就在地上铺一层茅草,而不动老百姓的铺盖。离开前,还要给房东挑满水缸、打扫干净院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人牢记在心。老百姓称赞我们做得好,主动做饭给我们吃。老战士很照顾我们新战士,参军后,我处处感受到部队的温暖。

不久,我任牙前县独立营二连某班班长,班里约有8名战士。连长觉得我忠诚老实,办事认真负责,对敌作战勇敢,团结战友,所以就让我当班长。

有一次,我们在青岛的即墨县活动,连长派我和班里的孙家豪、孙锡彬两个战士去袭击鬼子的据点。据点外面拉满了铁丝网,晚上,我们悄悄地摸到敌人的据点边,借着月光,向敌人连续投手榴弹。爆炸声中,趁着敌人混乱,我们又悄悄地撤退。还有一次,我单独外出筹集军粮,被鬼子发现。鬼子朝我开枪并展开追击。我跑得飞快,藏到了附近的麦田里,等鬼子走后

我才出来。我立过一次三等功。

我于1945年11月入党。由于我只上过一年学,文化水平低,排长隋坤山代我写了入党申请书。他和余指导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当时还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我说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一个月的候补期满后,我转为正式党员。后来我担任胶东兵站警卫营一连某班班长。

1947年2—12月,我担任过东线兵团司令部后勤警卫连副排长、排长。在这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中,我带领一个排30多名战士冒着敌机掷炸弹的危险,向前方阵地运送弹药。12月起,我担任山东兵团(七兵团)司令部参谋。在1948年9月解放济南的战斗中,我作为山东兵团司令部的小参谋,跟着后勤部副部长李厚坤跑前线。我还参加了淮海战役,也是做后勤运输工作。过年时,连队包了一顿猪肉大白菜饺子,大家一起快快乐乐地迎接新年。连队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以农夫和蛇的故事教育我们要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求和阴谋保持高度警惕。我们必须时刻听毛主席的命令,彻底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

1949年3月,我在七兵团司令部担任后勤警通连连长时,跟随部队南下。5月3日,杭州解放。我部驻扎在杭州笕桥机场。刚解放时,杭州非法的银圆交易很多。我带领战士去南山

路、西湖边检查,抓过一些不法贩子。我随部队在杭州汪庄休整了一段时间,负责后勤警卫工作。

1951年7月到1956年初,我在浙江军区某部任管理员。军区要办财经干校,领导派我招收会计学员。招生地点忘了,我记得是设在一个大礼堂里,我负责审查学员。招生任务完成后,我带领他们去莫干山学习。学员分为3个中队,我是三中队副队长,负责管理学员的生活。我还在浙江军区后勤学校卫训大队第九中队红旗分队担任过队长。

在莫干山时,我给家里写信,恢复了联系。1954年老家给我写信,说家里发了洪水,收成困难。部队给了我30元钱的补助,我邮寄回老家,老家的人买了一头驴种地做活。

1956年3月,我从部队转业。此后到1959年9月,我在嘉兴专区疗养院工作,担任总务处主任,主要负责修建房子、管理食堂和采购设备、物资等。后疗养院搬迁到临安。我还担任过临安区城关镇联合诊所负责人。

1959年9月,我到临安县青云区卫生所工作。这个单位成立于1952年10月,最初工作人员只有6人。1956年7月,设病床4张。1958年7月,改名为临安县第二地区医院。1960年1月,又改称青云区卫生所。当时卫生所有一座两层的小房子,医生和护士一共有十几个人,缺少党员,所以组织

上就派我到卫生所工作,主要负责行政事务。农忙时,我就带着卫生所人员去附近生产队帮助社员插秧、割稻。1961年,我调到县卫生局工作了一段时间。

后来,我到临安县卫生防疫站工作。县卫生防疫站当时在城关镇直街(今衣锦街)桂花弄内,与县卫生局合署办公。站长是赵久廉,工作人员有30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有26人。防疫站设有办公室及防疫、卫生、检验3个科。为了贯彻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我和同事经常下到生产队,和老百姓打交道,教他们如何预防传染病。另外,我还参加过县里下派的工作组,去湍口、岛石指导一些生产大队的干部选举工作。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县卫生防疫站工作处于半瘫痪状态,一些干部和技术人员受到冲击。1968年5月,成立县卫生防疫站革命委员会(1972年3月改为临安县卫生防疫站革命领导小组),工作局面才稍稍稳定下来。我到泉口“五七”干校劳动了一年。

1978年4月,县卫生防疫站革命领导小组取消。县卫生防疫站从县卫生局独立出来,恢复站长负责制,杨润新任站长。工作人员有32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有24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防疫站进入健康发展时期。1984年7月,实

行站长负责制、职工聘用制、科室领导聘任制。1987年4月,位于临安市木梳弄145号的新办公用房建成,占地面积3.78亩,总建筑面积3356平方米,其中业务办公用房1260平方米,另外有职工宿舍2096平方米。工作人员增至50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有36人。设站办公室、地方病防治、改水、图书4个室,防疫、计划免疫、卫生、食品监督、检验5个科。

1990年,我正式离休,退出工作岗位。

从旧社会到新中国,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从一穷二白到

国强民富,我和老伴是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的见证者。

我的文化程度不高,是个大老粗。我跟随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斗争,后来又被分配到卫生所和防疫站工作。总之,我始终以普通一兵的角色来要求自己,听党的话,服从党的安排,跟着党走,勤恳工作。当今我们的国家日渐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我晚年的生活也幸福安康,这一切都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

(资料原载于《初心如磐:临安离休干部和优秀共产党员访谈录》)



我的点滴经历

杨国坎

采访对象：杨国坎，1926年出生，山东荣成人，1946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淮海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长期在部队从事军需工作，曾任管理排排长、后勤会计、副处长、团财务主任等。1978年起任临安人民医院副院长。

一

1926年7月11日，我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宁津乡卢家村，村里有100多户人家。小时候，我家里有父母、一个哥哥、两个妹妹，共6口人，靠老祖宗传下的约4亩地生活，勉强能吃饱饭。8岁开始，我先后在本村小学和乡中心小学上学，一共读了6年书。

1938年，共产党在我们家乡建立了地方政权，老家成为根据地的一部分，为八路军提供粮食和兵源。1942年下半年，我参加了乡政府的工作，先做宣传教育工作，后来又做财粮工作，主要是到各村征收粮食，供应地方政府和军队。1945年，我在本村小学任教过一段时间。

1945年下半年，我参加了荣成县

石岛镇的民兵登记。苏联出兵助力中国解放东北地区后，把大连、旅顺的行政工作交给中国共产党管理。我被组织上挑选到大连、旅顺去做接收地方政府的工作。走到半路，我因感冒发烧留了下来，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后来我转到荣成县石岛大队做后勤工作，管理被服、武器等。

1946年2月，我到文登县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供训队学习（另有一个卫训队），这是组织上认定的我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1947年1月，我到胶东第五旅三团三营营部任管理排排长，配有一支小手枪。管理排人数不多，负责战士的吃穿用等后勤工作。1947年2月，三团奉命升级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二师五团，从威海走路到泰安，从此开始执行野战任务。

我到华东野战军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就是1947年4月解放泰安的战斗。我负责营里的后勤保障，粮食由地方供应，炊事班烧好饭后，我们负责送饭。烧饭时烟雾不能太大，以防被敌人发现。解放泰安大概用了3天，26日上午攻占泰安城，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七十二师师部及所属两个旅，俘虏

敌师长杨文泉。

一个人打仗,至少需要两个人保障供应。在解放区,粮食供应问题不大,基本有保障。到了蒋管区,情况就不同了。蒋管区的老百姓对我们不了解,不愿意卖粮,不收解放区的纸币。我们通常是先找到保长、甲长,让他们去筹粮。但他们也不一定配合工作,我们还要防止其跑掉。到地主家筹粮也有困难,有的地主一见征粮干部来了,就马上逃跑,有的大地主还把粮食偷偷放到墙里面,有的挖坑埋在地下。哪家有粮,具体能征收多少,甲长最清楚。我们收到粮食后,会写一个借粮字据给甲长。具体借了哪家多少粮食,甲长都有账目,等解放后,老百姓拿着条子再去向政府兑现粮食。

为了解决吃菜的问题,我们要和老百姓直接打交道。看到菜地,要先弄清是谁家的,再和他们商量。部队有纪律,不能随便拔老百姓家的菜。有的老百姓愿意卖,有的既不说愿意,也不说不愿意,实际上是不愿意。我们要耐心做工作,不能强迫和欺负老百姓。老百姓都很穷,我们也是老百姓出身,欺负老百姓就和国民党没有区别了。在敌占区,有时抓到国民党军队里管钱的后勤人员,能缴获一些可用的货币。

当时100斤小麦能磨出80斤面粉,麦麸不要。面粉装在袋子里,炊事班的战士肩挑背负。战士们基本能够

吃饱,但一个月都可能吃不上一顿肉。休整时,我们偶尔会买一头猪,以改善战士生活,但是这样的机会非常少。

我参加过攻打莱芜、新泰、孟良崮、枣庄、鲁南、滕县、沙土集等战斗。在鲁西南菏泽地区同国民党新五军相持时,天天走路、打仗,我部参加过4次阻击战,协助刘邓大军顺利渡过黄河进军大别山。1947年12月,部队过了黄河,到河南濮阳休整,补充物资和兵源。1948年2月,又重返黄河南面打仗。我到团后勤处工作时,豫东战役开始了,部队攻打商丘、扶沟、雁凌、许昌、漯河、开封,一直到秋天撤出战区。接着所部奉命参加攻打济南,走到山东济宁时,因为济南的吴化文部队起义,我们就没再前进,留在济宁休整,补充装备、衣服等,准备参加淮海战役。

运动战期间,我们大多数时间每日行军80—100里路。比较疲劳了,就借老百姓家的草铺在地上睡觉。傍晚五六点钟,晚饭一吃,给百姓放好草,打扫干净地面,挑满缸里的水,再出发。

行军过程中,我天天要和老百姓打交道。老百姓不知道谁是国民党的部队、谁是共产党的部队。但我们的行动与国民党军不一样,这个老百姓一看就知道。比如,遇到年纪大的,我们叫“大爷”“大娘”,遇到年纪轻一点的,叫“大哥”“大姐”。我们不损害老

百姓的利益,老百姓对此是看得很清楚的,说我们是支好部队。国民党军进村,不管老百姓同意不同意,看中的东西直接就拿走。国民党兵拉电话线,让甲长看管,说被偷了要找甲长赔钱。晚上,他们再把电话线收起来,找甲长要钱。国民党部队要发钱了,就找老百姓穿上士兵的衣服,多报人数,多拿军饷,排长、连长再把冒领来的军饷拿去吃喝玩乐。根据这些不同的现象,老百姓很容易分辨出来。

1947—1948年,美式装备的国民党新五军一直在我们后面追赶。部队通常是在夜间行军、白天休息。而白天后勤人员要去找粮食和军需品,所以休息的时间比战士还少。有时我在走路时就能睡着,走着走着撞到树上或走到沟里去了。

1948年10月底,所部开始向南进军,在徐州东面过陇海铁路到运河边的窑湾,歼灭了国民党的六十三师,师长被捉。清理徐州外围的国民党部队,攻下狼山之后,在徐州西南面山东、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包围了正在逃跑的徐州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整个淮海战役打了66天,歼敌55万多人。

淮海战役开始时,我还在团后勤处工作,后到师后勤部做财务工作,具体工作是在俘虏管理处管理被俘人员的衣食住行和路费发放。被俘人员一个连一个连地编好,连长、排长、班长

都是解放军,对俘虏进行政治教育,打算回家的发给路费,愿意参军的就编入我们的部队。回家路费的多少,根据离家远近等情况定,起码发给一星期左右的费用。国民党士兵也是被强行抓丁来的,有的到阵地上打几枪,找个地方一蹲,就等着投降做俘虏。我们优待俘虏,缴枪不杀,不打不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政策执行得很好,威力大。

1949年1月,我部向南行军到安徽宿州,在那里过春节。春季休整期间,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第一纵队整编为第二十军,隶属第九兵团建制。军党委发出了《为胜利完成渡江南进,完成京沪杭战役告全军党员书》,军政治部颁布了政治动员令,激发指战员的战斗士气。我们的口号是“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当时二十军五十九师师长是程业棠,政委是张文碧。

我于1949年4月入党。当时我主动提出了入党要求,写了申请书交给团部的后勤支部。申请书上主要写了我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表示志愿入党,保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怕牺牲,永不叛党。入党介绍人有两位:一位是在华东野战军一纵队二师五团后勤处管军需的战吉荣(我在后勤处管财务),山东文登人;另一位是五团政治处姓严的女同志,江苏溧阳人。支部大会通过入党申请后,我的候补期

为一年。入党宣誓在1949年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举行。我认为,能入党的都是先进分子,入党不是摆着好看的,要起带头作用,工作要干得好。我不能犯错误,要严格按照后勤规章制度,把本职工作干好。

到了长江边,对面就是丹阳,我们开始训练游泳、划船。山东兵好多没见过船,也不会游泳。我除了准备部队吃的用的,还负责动员老百姓把船供部队渡江使用,动员船老大把我们送到长江对岸去。在4月20日的渡江中,部分战士牺牲了。部队到丹阳后,接着从宜兴、长兴、湖州、嘉兴一路走到上海浦东。我们从浦东进入上海,在虹口打了一仗,国民党部队从吴淞口逃跑了。

在上海,我部属于警备部队,住在金陵东路,离黄浦江很近了,还有一部分住在浦东。解放军守纪律,在农村可以睡在老百姓屋檐底下,在城市里则不能随便住,累了就直接睡在大街上。

1949年7月起,我担任二十军五十九师后勤会计,还是负责财务工作。我们在上海外围住了一年多。我山东老家的亲妹妹,此时也参加了上海银行的接管工作。

二

1950年6月25日,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朝鲜战争突然爆发。9月7

日,二十军军长张翼翔到上海参加第九兵团军长、军政委会议。会上,华东军区首长传达中央军委决定:第九兵团解除攻台任务,开赴山东兖州地区整训,准备入朝作战。二十军下辖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八十九师。我所在的五十九师师长是戴克林,政委是何振声。

1950年10月,我们从上海乘火车到了山东兖州,接受朱总司令的亲自动员。11月3日,第二十军奉第九兵团命令:立即开抵吉林省通化梅河口地区集结,进行短期整补。所谓短期整补,主要是换冬季被装,因为当时部队长期驻在南方,只有薄的棉衣棉裤,难以适应严寒地带的作战。我们乘坐火车到达通化,我看到火车站内外躺着许多朝鲜难民。部队下发了御寒衣裤。

11月7日,我踏上了鸭绿江对面的朝鲜土地,感觉情况非常紧张,入朝第一天就遭到了敌机的轰炸。由于走的都是山路,后勤辎重车辆无法正常通行,物资只能由人扛。第二天,部队就和敌人交火了。天气非常冷,大家一无棉帽,二无棉袜。房屋都被敌机炸毁了,尤其是城镇,一片废墟,一间房子都不剩,防空洞也没有,晚上无处休息。后勤人员送上的土豆被冻得很硬,需要放到腋下焐热了吃。

二十军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前线困难越来越多,特别是粮食

和防寒物资的供应非常困难,非战斗减员越来越多。战士脚冻坏的很多,有的翻山越岭背粮食,脚都冻烂了,有的战士要把腿锯下来才能活命。总之,御寒物资准备不足。美军飞机的威胁非常大,白天火车不得不藏入隧道。汽车在白天难以行驶,但晚间行车也有敌机袭扰,我们打警戒枪,司机听到后必须立即躲避敌机的扫射。司机就在山路上闭灯夜行,但是也非常危险。为了安全起见,晚上行军时,我们把棉衣翻过来穿,因为里子是白的,和地上的雪一样白,让美军飞行员找不到目标。部队穿插行军,有时晚上翻一座山,天亮才到山下。

这些困难全靠我们坚强的意志去克服。曾被华野授予“一级人民英雄”称号的五十八师一七二团三连连长杨根思,抱起十多斤重的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用鲜血和生命保住了阵地。五十九师占领死鹰岭,打了六天六夜,与敌反复争夺,将美军陆战第一师拦腰斩断。后来我军濒临弹尽粮绝,加上天寒地冻,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美军残部从公路上侥幸逃跑。在牛团里,我们抓了不少俘虏,他们更怕冷。二十军各师减员较大,八十九师番号撤销,部队拆散,战斗骨干充实到二十军其他各师。

1951年4月,为挫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大韩民国军从半岛侧后登陆以配合正面进攻的企

图,志愿军发起了第五次战役。敌人一直向南撤退,想等我们的粮食、弹药耗尽,再对我们进行反扑。五十九师转战“三八”线南北,给予美军以沉重打击。特别是5月下旬,在北撤途中,志愿军遭遇美军闪击战突袭。我师与兄弟部队在华川、金城地区投入阻击战,历时50余天。

1951年夏,二十军转移至元山地区,担负朝鲜东海岸的防御任务。到1952年9月,全军上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协同兄弟部队建立了宽25公里、纵深15公里的多层防御阵地。1951年10月到1953年2月,我任五十九师司令部会计,仍然负责财务工作。人民币、朝鲜币和东北币有兑换比例。我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立过四等功两次。

我怀念牺牲在朝鲜的烈士。一七四团政委郝亮,我早就认识他了。他曾担任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独立一团政治处主任、团副政委,二十军五十八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等职。入朝时,他担任五十八师一七四团政委。1950年11月,他被任命为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但是,他向组织提出打完一仗后再到任。12月8日,在长津湖地区战斗中,其所在的指挥所被敌机炸弹击中,他壮烈牺牲,年仅33岁。五十九师一七五团团长洪定太参加了第二次、第五次战役。1951年4月27日,在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他率该团一营

向长明庄穿插,准备合击南逃的美军二十四师一部时,遭炮火袭击而牺牲,年仅33岁。慕宗和与王本勤在第五次战役中牺牲,他们的尸骨至今还在韩国,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

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永远值得纪念,帝国主义的野心足以引起后人的警惕。中国强大了,美国不舒服,但是中国的强大是不可阻挡的。

三

1952年10月,我部在朝鲜换防后回到上海嘉定,年底乘坐军舰到宁波,1953年春节到了萧山。

1954年开始,我师在杭州留下、中村修造一个师的营房,即留下师部和两个团。建房子时,部队指战员负责烧砖和拉水泥、石灰等,技术人员由杭州方面负责派遣。我属于机关工作人员,没有到工地。

1954年4月,我部到徐州接收苏联坦克,成立了坦克团,我任代训团财务主任。几个月后,该坦克团调往山西大同的训练基地,我回杭州留下师部教导团担任财务主任,后到一七七团担任财务主任。1955年,我被授予陆军上尉军衔(行政18级)。

1966年6月,我到地方参加“四清”工作,被分配在余杭县黄湖公社朝阳大队工作组。12月,工作组撤走,我又回到部队。1967年,我被派到杭州人民银行担任军代表,干了三年。接

着调到杭州纺织工业局,干了两年多。随后到杭州市公安局二处工作。

1978年4月,我去临安人民医院报到。当年10月担任副院长,一直工作到1984年5月。

这一时期,是临安人民医院由拨乱反正走向发展的时期。1978年4月,医院革命委员会取消,恢复建立党支部,并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院长分工负责制。1980年1月,临安县被省卫生厅确定为卫生事业首批三分之一重点建设县,我院被县里列为重点建设医院。

我到临安人民医院工作时,医院都是平房,房屋陈旧,面积较小。我和医院领导班子着手筹钱,新建内科病房楼,并于1980年建成。1984年、1986年又分别建成了干部病房楼、急诊室楼。为建设职工宿舍,我亲自到杭州争取建筑材料,1986年建成了1341平方米的职工宿舍楼。还着手全面整顿,调整科室组织,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推进机构改革,按“四化”标准配备各科室的领导班子,科室部门领导实行聘任制。我又努力为医院添置设备。当时省卫生厅安排的设备,优先照顾温州、丽水、台州等边防、边远地区。我有战友在卫生厅医政处工作,通过他们为临安人民医院争取到了X光机、科室的冰柜、食堂的冷柜等设备。通过在萧山齿轮机械厂任副厂长的战友,为医院食堂做了十多辆保温

车,该厂没有要钱。另外还努力解决医院困难职工、退休职工子女顶职和就业问题。职工王虹强是顶职工作的,当时16岁,各个科室都不要,他只好在食堂工作。我鼓励他不要灰心丧气,后把他送到杭州仪器修理所学习。他掌握了一定技术后,去医院电工间工作。当时大家说我把他当自己的儿子一样关心。1986年底,我正式离休。

四

我在部队工作了32年,在地方工作了8年。回顾一生,我认为自己做了四件最为高兴的事。第一,从江北到江南,从国内到国外,我参加大小战斗60余次,做了自己的贡献。第二,我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都是管钱管物的,一直账目清楚,两袖清风。个人省吃俭用,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第三,1957年,我在浙江绍兴收留了一名出生仅50多天的婴儿。她家中有父母、外婆等9口人,是城市贫民,生活非常困难。当时恰好遇到一名乡下人找做奶母的工作,我先让奶母将婴儿带回家,一个月后我将婴儿接回家,又换了保姆照顾她。这个孩子就是我在现在的养女。另外,我部驻浙江奉化时,我

在去宁波办事途中,看到路边稻田的水车车盘上放着一个弃婴,我便抱到宁波同事的亲戚家里寄养。第二次去看时,因为这个男孩长得很俊,同事的亲戚不想让我抱走了。再加上孩子当时已经9岁,所以我就没要回了。最后一次,我去宁波顺便看他时,他已经16岁了。第四,我乐于助人。1955年实行薪级制后,我在经济上帮助过6名家庭困难的人,尤其是亲戚。

以上是我一生大致的经历。和时代的洪流相比,我对国家和人民没有大的贡献。我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中,我在团部后勤处负责财务工作。有一次,我和3位炊事员做好早饭送往前方,路上敌机投下了500斤左右的炸弹,前面3位同志牺牲了,我走在最后因而没有受伤,捡回了一条命。那些牺牲的同志,更值得我们纪念。我个人的历史,是时代洪流中的几片浪花,没有什么好值得纪念和留恋的,真正伟大的是我们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

(资料原载于《初心如磐:临安离休干部和优秀共产党员访谈录》)

求学路上三条岭

杨菊三

三条岭,三个求学时段走过的路。光阴倏忽间过去了四五十年,而今回想起来犹历历在目。

我的启蒙教育是在自己的村小度过的,那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一个衣食有忧的农村。而四年级以后,就得到公社中心小学去上学了。学校的地点在公社所在地一隅的一个山湾里。这里四周环山,场地开阔,原有一个寺庙,解放后改作学校了。全公社十三个村,一至三年级都在自己的大队解决,四年级以上的高段学生全部到这里就读。中心小学是寺院改建的,悉数都为平屋,凹字形,凹口朝里,而外墙背面是一个大大的操场,操场出去是一个斜坡,遥遥地对着三口集镇。大多学生都从这条路来上学读书。

学校的背后有一道山岭,羊肠一样地斜挂在那里,歪歪扭扭地通向我家住地在内的三个大队。这条山路叫寺岭,虽然只有一里光景,却狭而弯、陡而细,坎坎坷坷,高高下下,我们管它叫野猫路。两旁全是一人来高的毛柴。学校到我家有三里地,先要翻过这条寺岭,再走两里山路,就是我们的山村了。

我们都是走读生,每天都要翻越这条寺岭。我家出来的路,算是大路。说是大路,其实也只有米把宽,连双轮车都拉不过。可是与寺岭比起来,我家出来的这条路则称得上是康庄大道了。寺岭的脚下有三两户人家,皆是茅草屋,但主人却十分和善,见着我们都是笑意盈盈的。走过这个名曰“凤凰山”的小村后,寺岭也就在眼前了。从起步处看寺岭,蚯蚓似的羊肠小道幽幽地伸向了丛林之上。因有几个山弯挡着,望也望不到头。那时我们年岁尚小,脚步迈不大,翻越这条岭,总会哼哧哼哧地直喘粗气。它沿山势而筑,见坡弯而绕,既无石阶,又无护栏,幸亏两旁都长着密密匝匝的矮毛柴,故而不必担忧坠下山崖。我们背着书包,拎着冷饭,每天都得赶,而且每每合着“当当当”上课的钟声。

天天在寺岭上行走,时常看到鸟儿扑楞楞地在柴丛中飞进飞出,知道柴丛的里面一定会有鸟窝,于是就与几个同学钻进柴丛去捣,但柴丛那么深,时间那么紧,总是在长吁短叹中无功而返。一次,我们在柴丛中搜索时,突然蹿出来一只灰不溜秋的野兔,我们喊呀追呀,怎奈没有一个人跑得比

野兔快,那野兔转瞬间就从我们的眼前跑掉了。夏日走过寺岭时,我们常常能闻到杨梅的香气,但它一般都站在岗岭之上,我们没有这多时间去采来解馋。但秋风一吹,乌米饭的果实却乌黑了。矮毛柴中,乌米饭是最得宠的,到了这个季节,悉数都成熟了,挤挤挨挨的缀满枝头,看一眼都让人喜欢。我们都会放学的时候一饱口福,有时还会带半衣兜回家。

寺岭以前是香客的便道,三口寺办起中心小学后,就成了莘莘学子的专线,除了我们这些学生之外,没人会从这条寺岭上走。到了寺岭的垭口之上,整座学校一目了然。垭口下去的路很短,也就是一二百米,但十分陡峭,而且还呈之字形。这点路难不倒我们这些山里的孩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过去了。垭口是一个制高点,在这里极目远眺,看得到远处的村落和汽车,是最得风味的地方。有一天晚上学校的操场上放映露天电影,父亲还带我去看过。那时家里穷,五分钱一张的电影票都买不起,就是盘腿坐在垭口上远远地解馋的。

读完小学,我又在这里读了两年初中,又与寺岭亲密接触了两个长载。因为流生太多,原本的两个初中班学生只剩下了不足三十个人,第三年,也就是1970年,将我们20几个学生并到了板桥初中。

我家距板桥中学有十里路,坐客车要兜个大圈子,且还得多跑家里到

车站的两公里冤枉路,不合算,况且那时穷得丁当响,哪有钱坐汽车?于是,还得开动“11”路,用自己的脚丈量远近。

以前我没有去过板桥,但它的大致方向是知道的。父亲说,去板桥最省力了,你只要沿着水泥电杆走,走到半中有条观音岭,翻过观音岭,不要一个小时就到了。可不是,我家门前的水泥电杆早在几年前就立在那里了,说是军用电话电线,故而比我们民用的木头电线杆来得考究。

从我家到板桥10里路,比从三口走要近一半,只需沿着水泥电杆走就行。我就将水泥电杆作为标识,沿着它向前。那路虽细小扭捏,却是依山傍水,两旁树繁林茂,修竹摇翠,不到两公里,就是转向观音岭的曲径小道了。上岭的坡有点陡峭,也有点曲折,而且拉得特别长,脚力好的人得走半个来小时。那时我已十八岁,精力旺盛,一口气就爬到了岭头。岭上有一凉亭,是专门为过路的人修的。我也没有进去歇息,只是朝来路眺望,但见过来的路细如米线,在莽莽苍苍的大山深处若隐若现,只见着脚下的尾,却看不到来时的头;而前行的路,则如一条扁担,弓着脊背,长长地伸向远方。有人说观音岭是扁担岭,又道是黄胖岭,看似崖壁不高,坡度不大,但走起来往往要累得腰痛腿酸的。还好,在观音岭的那边,悉数都是下坡路,迈起步来自然会轻松一点。

观音岭与村坊隔得远,与烟火相距遥,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小时候听人说,这里的妖魔鬼怪特多。那时候听观音岭的鬼怪故事,气都不敢出。而今到了这个地方,也是汗毛凛凛的,所以我也不敢到亭子里面去看一看、坐一坐。我测算了一下,这条观音岭怕有三里长,而且两边多是柴丛茅草,不时还会撞到一座座孤坟,是有些瘆人的。

我一般是一个星期回家一趟,也就是说一周要来回翻越两次观音岭,大多时间都是我一个人独闯。尽管走的次数多了,也不敢到亭子中去歇歇脚。有一次放学时走过那里,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无奈中只得硬着头皮到里面去躲雨。那时已是傍晚时分,又值雨天,光线暗暗的,凉亭里面更是暗得伸手不见五指。我用各种方法给自己壮胆,结果还是吓得瑟瑟发抖,也不顾野外的雨有多大,一个箭步冲出凉亭,让自己淋了个落汤鸡。

三里观音岭,一里在我的家乡,两里在板桥那边。它在测试着我们的脚力,测试着我们的胆量,锤炼着我们的意志,故而至今依旧不得忘怀。

我的高中生涯是在临安中学度过的。1971年,还是家境维艰,生活苦涩。从家里到临安,走大路坐汽车路远不说,还得掏5角5分钱的汽车钱,而翻山到县城,只有15公里路,比走大路近了三分之一。但走近路有二十里是山路,还要翻越十多里路的小横岭,

一般的人吃不消。我们都是从苦窝中爬出来的人,在求学路上这点苦都受不了,那还算什么男子汉?故而除了第一趟要带一只箱子和众多行李坐了客车外,其余的来回都是跋山涉水全凭自己的两条腿。

这三十里路,去掉一端的土路和另一端沙子铺筑的公路以外,有一半为小横岭。从家里出发,经过珠坞,再翻上铁世坑,六七里山路走下来后,见着的就是小横岭。岭的这边,竹梢拂面,藤萝缠身,一条羊肠小道绕着弯儿向大山伸去。山道比手掌宽不了多少,既无石级,也无遮挡,行人相遇只能侧身而过,一旦碰到雨天,假如你没带伞的话,只能钻进柴丛竹丛去躲避,这种避雨之法,对于阵雨而言还能将就一下,要是碰到绵绵春雨,那是毫无用处的。这么高峻的大山,我总会与一些同学结伴而行。熊瞎子是没有的,但不能保证没有狼和豹的突然降临。有几个同伴在一起,可以互相照应,哪怕遇到蛇虫百足,也可以坦然处置。

铁世坑以上只有一条直路,只管朝前行走,但待到前面的大山撞着了鼻头的时候,就得朝右拐弯了,拐弯后山道显得逼仄,你只能铆尽气力地去登,手脚并用地去攀。来到一条小溪时,你就得向左转弯了,再继续往上发力。这一段路最荒凉,两边杂竹遮拦,乱柴挡道,衣衫往往会被藏在竹丛柴丛中的荆棘勾破。

上了山梁后,我们总会在这里看看景,歇歇脚,养养精神,但只能限于春夏秋三季,冬天可不行。这里的山风特别大,要是在寒冬腊月,你根本站不了一分钟,那风定然会吹得你打颤,让你在拔凉拔凉中喷嚏连声,冻出感冒。

山下是一片毛竹林,有石阶自山顶一直铺到山脚,这便是小横岭中最规矩的路段了。石阶按照山势的平缓与陡峭而砌,一会儿朝左扭,一会儿朝右拐,让人在拿捏不准时写着一个个“S”。这条道的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是先民们经年累月的发力,造福了一个又一个的行路人,包括我们这些学子在内。长年的踩踏,石阶的表面都磨出了光泽,有少数石块破碎了,有的还移了位,有的被树根拱起,有的被竹笋掀翻,在伤痕累累中发出无声的呼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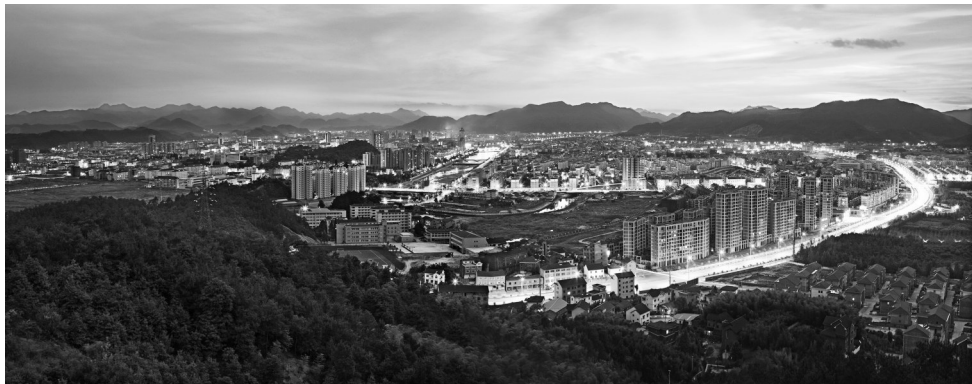
下坡路总归要好走一点,而长时间的行走,便显得有些勉为其难了。

一座山,半条岭,如果不下点决心,你肯定攀不上去。这如同小横岭,来时柴丛荆棘,去时石阶高坡,如果缺少毅力的话,也是过不了这道坎的。

来来回回的奔波,双腿难免会被砾石磕破,脚板被尖厉的竹桩截伤的同学也不在少数。我们虽然出身贫穷,但毕竟还是稚嫩,稍稍走一段路就累得粗气直喘。有的同学怕鞋底磨穿,还带了草鞋,专门为了翻越小横岭用。我左腿的静脉曲张,就是攀爬小横岭时落下的。但我们终究凭借自己的毅力,顽强地翻越了一道又一道峻岭,完成了学业。

从小学、初中再到高中,寺岭、观音岭、小横岭伴着我的求学之路,这三道岭在有意与无意中磨练了我的意志,锻造了我的胆魄,启迪了我的智慧,滋养了我的心灵,让我终身受益。

(作者为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忆岛石 最忆山核桃

蒋瑞斌口述 帅军武记录

1965年4月,县委召开干部大会时宣布,我被调到岛石公社任党委书记。当时,很多同事、朋友都好言相劝:“……岛石太偏僻,交通不方便,条件又很差,你不能去。你气管炎毛病这么严重,岛石的冬天又特别冷,对你的身体会有很大影响的,你向领导反映一下,组织上会考虑的。”说句心里话,当时我也不愿意到临安最边远、最贫困的岛石公社去工作。但是,我是共产党员,不能“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那时候我还年轻,领导安排我到最艰苦的公社去工作,对我是一种信任、一种考验、一种培养,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次锻炼的极好机会。于是,我没有向领导、向组织提任何条件和要求,便踏上了去岛石工作的新征程。

那个年代的条件可没有现在这么好,龙岗到岛石的那条公路,还是一条没有铺垫砂子的“半成品”公路。我去岛石那天,客车从龙岗进入昌北山区狭长的峡谷时,路面坑坑洼洼,道路起伏起伏、弯弯曲曲,客车一路上摇摇晃晃,乘客个个战战兢兢。而那条“龙岛公路”(从龙岗到岛石)还是一条“断头路”,客车只能到鱼跳。从鱼跳到岛

石还有27里路程。下车后,我一头箱子、一头棉被挑着担子,在羊肠小道上步行到岛石。

走进岛石时,一眼望去,满山遍野都是山核桃树,竹木等其它树种稀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这么大面积的山核桃树林,岛石山核桃便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了及时、更多地了解到岛石百姓的生产、生活实际情况,以及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等,第二天起,我便在当地公社干部的陪同下,爬坡越岭步行到各大队(行政村)、各生产队(村民小组)调查了解各方面情况。岛石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人口多、耕地少,农民辛辛苦苦生产劳动一年,粮食只够吃半年的,那时候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凭粮票供应粮食。岛石缺粮情况严重,农民吃饭依靠国家供应返销粮,青黄不接时节还得以“瓜菜代粮食”才能度过缺粮关。

那个年代,岛石农民温饱得不到解决,条件非常困难。但是,无论干部还是群众,精神都很饱满,对生活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岛石百姓非常好客。每次结

束调研,我准备返回公社时,他们都会捧出一盘煮熟烘干的山核桃,硬是往我口袋里塞,并且把我中山装上衣的两只口袋,装得满满的才肯善罢甘休。

回到公社宿舍,我便取出山核桃来品尝,让我没想到的是,那种山核桃越吃越想吃让我“欲罢不能”,真正体会到了山核桃的“回味无穷”。原来,那是一种水煮黑色的山核桃,那种黑色是自然的黑,是山核桃脱去蒲后,放锅内煮熟形成的黑色。把这种煮熟的黑色山核桃,用炭火烘烤干燥,才是原汁原味、自然果香、回味无穷的山核桃。

吃山核桃也是一门学问。刚到岛石那段时间,看到当地农民吃山核桃时,很轻松就咬开了山核桃硬壳,我却咬得牙痛费力。后来才知道,咬山核桃硬壳必须找准方向,上下牙要对准那条裂缝咬下去,不但外壳容易碎,里面的肉也不会破损,吃起来也就更轻松、更有味道。

那时农业生产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山核桃属于统购物资,由供销社统一收购,每百斤只有30元,除掉百分之八的特产税,每斤只有0.27元。虽然山核

桃的价格很低,但是对岛石农民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影响却很大。山核桃产量高的大队、生产队,年终分配时,分红率就高。如黄阳、张家、楼下、竹坞、阁川等大队的生产队,山核桃大年的分红值,每10工分可分到现金一元以上。而直川、江川等,山核桃产量低的大队、生产队,分红值年年都在5角左右徘徊。集体生产那些年,山核桃产量直接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山核桃大年时,农民参加集体劳动的积极性便高涨,因为多挣工分可以多分红。

在岛石公社的12年里,我爬山过岭走遍村村寨寨,与当地干部群众结下了深情厚谊,岛石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是经常下村爬山过岭,锻炼了我的身体;也许是常吃原汁原味的山核桃,营养得到了调整和补充的缘故,我原来严重的气管炎,竟然不知不觉痊愈了。

忆岛石,最忆山核桃。现在回忆在岛石公社工作的那12年,虽然已经过去了50多年,却让我像品尝原汁原味的山核桃一样记忆犹新、回味无穷!

(作者:蒋瑞斌,曾为岛石公社党委书记;帅军武,临安区作家协会会员)

省老促会来临调研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工作

9月28日,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促进会副秘书长金成、副秘书长兼中国狮子联合会浙江代表处负责人金炜一行来临安调研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工作。临安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钱铮、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方英儿、岛石镇党委书记叶浩然等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上,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钱铮对省老促会调研组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方英儿对临安革命老区情况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随后,调研组一行听取了岛石镇关于老区建设、乡村振兴等

情况的汇报。叶浩然书记从交通、饮用水、医疗、教育等方面介绍了岛石镇近几年所取得的成绩,并分析了镇村养老服务工作中所存在的短板。同时,叶浩然书记希望省老促会能结合革命老区当前所存在的困难,在民生实事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给予支持和帮助。

调研组一行对岛石镇老区建设、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建设等方面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就下一步如何加强合作、积极引资引项为老区人民办实事进行深入地探讨。



9月主题党日活动:体验天目红盟“初心之旅”

9月25日,区委党史研究室全体党员干部赴昌化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体验天目红盟“初心之旅”。

活动中,党员干部们参观了昌化国石印象馆、红色记忆馆、8300印信馆、云上白牛等场所,聆听和感悟昌化镇的红色印记、社会发展、城镇建设、美丽乡村等蝶变历程。

党员干部们对昌化镇的印石文化、红色文化、古镇特色文化、电商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深刻感受到了

昌化镇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的显著成果。

历史和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根”与“魂”,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中起着重大作用,随着时间的积淀愈显价值。作为史志工作者,我们更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尽职尽责,发挥职能作用,多层次、多点位挖掘文化基因,为建设“城西科创新城·美丽幸福临安”提供史志保障。

“清廉养心 健步养身” 区委党史研究室开展绿道毅行活动

崇廉尚洁,清风常伴。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营造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推进清廉机关和健康单位创建,10月25日下午,区委党史研究室开展10月固定主题党日暨“清廉养心 健步养身”绿道毅行活动。

10余名党员干部从职工之家出发,沿着“琴山蓝湾”党建示范带,先后来到琴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琴山蓝湾村落景区(宪法公园),在“琴山清

韵”清廉文化公园,大家逐一学习了俞琳、洪咨夔、赵抃等人的生平事迹,一边阅读清廉故事,一边领悟其中蕴含的廉政思想和深刻内涵,真真切切地上了一堂主题鲜明、内涵丰富的廉政文化教育课。

此次绿道毅行活动历时2个多小时,全程5公里,不仅以健步养身,锻炼了身体,也以清廉养心,让廉洁意识稳固于心。

临安百年党史专题纪录片即将出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天目大地发生过哪些重大党史事件?三县解放,经历了哪些曲折和斗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临安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八大以来,临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是怎样牢记初心使命,克难攻坚?……为全面回顾中国共产党在临安的光辉岁月,为全区党员干部群众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生动载体,区委党史研究室充分发挥党史部门资源和专业优势,联合专业制作公司,历时4个月,拍摄了一部片长近半小时的临安百年党史专题纪录片。

11月19日上午,为进一步提高该纪录片拍摄质量,区委党史研究室召开专题片审会,邀请原临安市市委书记、原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保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建华,原临安县副县长、《浮玉》杂志主编潘庆平,原临安市政协秘书长、《临安市志》主编王建华等一批老领导、老同志和各行各业专家

参加。

区委党史研究室、拍摄方央广网浙江频道相关负责人员分别从该纪录片的思路、框架、内容、片长等方面简要介绍了基本情况,使与会人员有了全面了解。随后播放该纪录片样片,进一步加深对该纪录片内容的了解。看完专题纪录片后,参会的老领导、老同志和专家纷纷发言,在肯定前期工作基础上,从播放节奏、开篇引言、篇章标题、内容补充、画面完善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听取意见后,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方英儿指出,在建党百年拍摄这样一部党史专题片,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临安党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区委党史研究室会后将认真梳理征集到的意见建议,结合实际加以修改完善,争取制作成为一部时间脉络清晰、内容全面突出、文字通顺优美、画面清晰美观的专题纪录片。



区委党史研究室召开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学习会

11月25日,区委党史研究室结合固定主题党日活动召开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学习会,党支部书记、副主任许月琴主持,全体党员干部参加。

围绕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结合党史研究室工作职能,室主任方英儿指出,我们党史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学深学透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决议》核心要义,立足新时代历史定位,坚持“一突出、两跟进”,着力提升学习能力,增强政治自觉,要聚焦主责主业,发挥自身优势,守正创新,筑牢基础,做好“征、编、研、

宣”文章,切实发挥史志工作“资政、育人”的职能,构建系统、全面、规范的资料征集整理体系、成果展现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服务好党和政府中心大局,高质量开创史志工作新局面。

副主任许月琴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决议》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以“数读”形式解读“四个历史时期”“两个确立”“十个明确”“十个坚持”等十余个要点,并部署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六讲六做”大宣讲活动。

与会的党员同志还签订了《党员不信教承诺书》和《党员规范网络行为承诺书》,并缴纳了党费。

